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新人口论

 **eBOOK**
网络资源 中国版

序

张纯元

马寅初，又名马元善，浙江省嵊县人。现代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

马寅初 1882 年 6 月 24 日出生在绍兴县小皋埠村的一个酿酒作坊主家里，幼年随父亲迁往嵊县浦口镇居住。在此度过了读私塾的少年时代。1898 年到上海英华书馆读中学。1902~1906 年在天津北洋大学攻读矿冶专业，因学业优秀，秋季毕业后被保送赴美留学。1914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 年回国在财政部任职。1916 到 1927 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先后担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教务长。同时还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总司券、中国经济学社社长等职。1927 年后，任浙江省府委员、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此时他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营私和腐败，疾恶如仇，思想倾向进步。他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要求抗战卫国，反对出卖民族利益；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要求稳定币值，反对通货膨胀、搜刮民财，并在立法院正式提出议案，主张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公开抨击四大家族，因而被国民党反动派于 1940 年 12 月投入息烽、上饶集中营。在社会舆论压力和中国共产党的营救下，1942 年 8 月出狱。但仍被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不准任职，不准讲演，不准发表文章。马寅初先生的崇高爱国热忱、威武不屈的气节、大义凛然的正气、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称颂，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寅初先生担任重庆大学教授，后又到上海担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工商专科学校教授。此时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在经济上反对通货膨胀，反对官僚垄断，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力主发展民族经济。他不畏强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积极参加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几次上街示威游行都是与学生手挽着手，昂首挺胸走在队伍的最前头。1947 年 5 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阻止他前往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表演讲，扬言马寅初一旦出席会议就杀死他。马寅初先生对这种威胁嗤之以鼻，他预先写下遗书，毅然出席会议，特务为之无可奈何。1948 年下半年，马寅初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处境已相当危险，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化装成一个厨师，经由香港转移到解放区，1949 年 9 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寅初先生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届委员，第二届、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第一届和第二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他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赞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热情讴歌新中国的巨大成就，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党和政府进言献策，在经济、人口、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难得的真挚诤友。

马寅初先生早在 50 年代初期就十分关心我国的人口问题。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准备，于 1957 年 6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了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受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此前后还发表了一些文章，并在不同场合就我国人口问题发表多次演讲，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表现形式和解决的办法。

一、我国存在着人口问题。马寅初先生逆着人口愈多愈好、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存在人口问题的教条主义之风，提出了我国存在着人口问题的崭新观点，其主要内容是：(1)人口基数大，1956 年已有 6.2 亿；(2)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高，一般都分别在 34‰和 22‰左右；(3)人口增长太快，1954 年到 1957 年平均每年净增人口 1362 万；(4)我国人口质量低，身体素质较差，平均文化程度也较低；(5)我国经济底子薄，人均各项经济指标低，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人口与经济的种种矛盾与问题。他为了说明人口发展太快的严重性，做了简单的预测。他说：“如以净增率 2% 计算，15 年后将达 8 万万，50 年后将达 16 万万；如以 3% 计算，15 年后将达 9.8 亿，50 年后将达 26 亿。”如此重大的、现实的、几乎每天都碰得到的人口问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否则“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马寅初先生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人口问题的第一人，尽管他是根据中国人口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但在理论上的突破性、创造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丝毫也不能低估的。

二、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表现形式。马寅初认为，中国人口问题具有相对人口过剩的性质，是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类型。他说：“人口增长得太快，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又说：“我国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 6 亿多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因此，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发展的阻碍。”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是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类型的。

马寅初认为，人口发展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并在量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就会表现出许多不适应，表现出许多矛盾来，这许多矛盾实际上就是人口问题的表现形式。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马寅初认为，人口太多增长太快已经引起了十大矛盾：

1. 人口迅速增长与生产设备不足的矛盾；

2. 人口迅速增长与工业原料增长缓慢之间的矛盾；
3. 人口迅速增长与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之间的矛盾；
4. 人口发展快与资金积累慢之间的矛盾；
5. 人口增长快与就业不足之间的矛盾；
6. 人口发展快与教育事业落后之间的矛盾；
7. 人口发展快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慢之间的矛盾；
8. 人口发展快与粮食增产缓慢之间的矛盾；
9. 人口质量低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10. 人口发展快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

据此，他尖锐地指出：控制我国人口增长，实属刻不容缓。人口增长被控制住了，十大矛盾就会缓解，逐渐还会消失，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才能协调向前发展，我国的现代化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三、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和一些具体办法。马寅初认为，我国的相对人口过剩与资本主义的不同。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类型的，它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又是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我国的人口相对过剩，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自然资源开发比较缓慢、生产发展相对不足造成的。因而，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人口问题的解决，“就业问题的解决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此，我们充满信心，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他根据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途径，这就是：(1)积极发展生产；(2)控制人口数量；(3)提高人口质量。并且，把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深刻地阐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他认为：“人口与生产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因为只有生产发展了，人口与经济的许多矛盾才能缓解和消除。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解决人口问题的物质基础，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主要手段。

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除积极发展生产外，还必须大力控制人口数量。马寅初明确指出：只要把人口控制起来，富国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崇高的愿望不难成为现实，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1. 实行定期的人口普查，建立人口动态统计。目的是做到心中有数，给我国制定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提供准确的数据。

2. “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而计划生育又主要是计划好人口出生率，使其与我国的各种自然资源相平衡，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协调。

3. 加强控制人口重要性的宣传工作。因为计划生育是千家万户的事，又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必须使每个人“都明知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4. 提倡晚婚晚育。他主张男 25 岁、女 23 岁结婚为宜。
5. 运用经济手段推行计划生育。
6. 运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
7. 运用避孕的办法，达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的。

近 40 年来，我们国家所执行的人口政策以及许多具体做法，充分证明了马寅初先生 50 年代的这些主张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是正确的，也是有远见的。

人口问题，不单纯是个数量问题，也有质的问题。我国存在的人口问题，不仅是人口数量多、增长快的问题，也有人口质量低的问题。马寅初指出：“我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之两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为了全面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他建议：必须大力提高人口质量，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我们已经进入了原子能时代”，这个时代的斗争是“智识的斗争，不是人数的斗争”。只有提高人口质量，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才能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才能有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国家和人民才能富强起来。

马寅初的人口思想及其代表作《新人口论》在 50 年代曾经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逆境中，他毫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斗争不止。“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刀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我从不考虑个人和名利，我只考虑国家和真理。为了真理，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表现了一个社会科学家维护学术尊严、为真理而献身的非凡勇气和高尚品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既证明了那场对马寅初人口思想的批判是一次历史性的错误，理所当然的应为马寅初先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证明了马寅初的人口思想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客观真理性。科学的东西不怕批判，正确的理论威力不减。真理在反复实践中才能被人们普遍认识，真理经过时间的考验才更能放出夺目的光辉。

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十分重要。人口群体是自然生态中高级的具有能动性的因子之一。人口与自然生态环境应保持和谐的互相促进的发展关系，使人类的繁衍处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的高质量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否则，人类在破坏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就在拆了自己的台，在污染大气、水体、耕地、住宅、道路等环境的同时也就在缩减自己的寿命，在使其他生物物种减少、灭绝（世界每天灭绝动植物 160 种）的同时也就为自己走向死亡准备了坟墓。

最初，人类出现在自然生态中，人口与自然生态环境是协调的、互补的，有着良性循环的关系。只是到了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不合理经济活动的加剧，才出现了人口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恶化。但是，当这种关系还没有超出自然生态因子的自净能力时，人口与生态的关系仍是正常的，并没有出

现什么人口生态问题。当人类社会进入到 18、19 世纪时，人口剧增，产业革命，人们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加之不科学不合理的各种经济活动，才使人类对自然界物质的利用、破坏、排放超出了它自身的再生能力和自净能力，造成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生物污染和各种自然资源的短缺，从而产生了人口生态问题，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除了自然界各因子之间的永无止息的生物、物理、化学变化之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人口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越多，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大；(2)人们不科学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这是导致某些资源短缺和出现污染的主要原因；(3)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对各种物能的使用、营养源的吸纳和对废物的排放，人们的生活方式科学与否对生态环境影响极大。这三者既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也同时为人们提供了进行环境保护，求得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三条渠道，其中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一条更具有基础性的特殊意义。

在生活水平一定的条件下，人口发展到生态环境自净力的临界点，人口再行增加就会造成人口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就是在其他两个原因不变的情况下（更不用说发展了、加大了），单就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必然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人口数量增加越多，生态环境遭受的破坏和污染就越严重。仅就这点来说，就足以看出，马寅初先生在 50 年代提出的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主张对保护我国生态环境的重大意义。1957 年我国人口已有 6.4 亿，如今已突破 12 亿大关，那时马老先生提出的人口过多所造成的各种矛盾，如今不但继续存在，有的还更加尖锐和严重，给生态环境带来了难以承载的重负。

首当其冲的是人口增长给耕地带来的巨大压力。1949 年我国人均耕地 2.71 亩，1957 年为 2.62 亩，1990 年下降到 1.27 亩，1996 年仅有 1.12 亩，减少一倍多，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26%，是美国人均水平的 8.7%，澳大利亚人均水平的 2.6%；而且，分布又不均衡，有三分之一省区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有的土壤质量退化严重，盐碱地面积超过 1 亿亩，有机质含量减少，土壤板结，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由于人口增加，不得不扩大耕地面积，于是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破坏了生态的自然平衡。

其次，人口增加给草原也带来巨大压力。我国只有可利用草原 33.65 亿亩，人均 2.88 亩，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 32%，只及美国人均水平的 21%，澳大利亚人均水平的 0.7%。由于我国人口对草原资源压力的增大，造成过度放牧，近 15 年来，平均每亩产草量下降了 30~50%，加之不合理的农垦，草原植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水土保持能力降低，风蚀日趋严重，沙漠化不断扩大。仅 1949 到 1980 年间新形成沙漠面积就有 6.5 万平方公里，加上历

参见 1995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美国人口咨询局出版的《1995 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以下所引数据均同此。

史已有的，使沙漠化土地东西走向长达 5500 公里，涉及我国“三北”地区 11 个省区的 207 个县市，危害着 3500 多万人口的生计。

其三，人口增长造成森林覆盖率的降低，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到处毁林开荒、过量采伐，加上森林火灾，使我国林业资源急剧减少。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 13.92%，美国比我国高 18.5 个百分点，日本比我国高 53.98 个百分点；森林面积我国人均只有 1.64 亩，只及美国人均森林面积的 8.7%，加拿大人均的 0.7%；林木蓄积量我国人均只有 9.82 立方米，只及世界人均占用量的 10%，而美国为 84.16 立方米，加拿大为 772 立方米。由于森林覆盖率低，加之分布不均，严重削弱了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净化空气、美化环境、旅游憩息等功能的发挥，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壤板结、肥力下降、气候变坏、雨水失调，导致河流含沙量加大、水库淤积、河床抬高、航道变窄、洪峰难以消退等不良后果。

其四，人口过快增长也加剧了我国淡水资源的紧张程度。我国淡水资源不丰，而且降水在时空分布上很不平衡，地下水分布也不均匀，加上人口的过快增长，使本来就处在短线上的淡水资源更加紧张。目前，我国人均淡水资源只有 271 立方米，排在世界第 88 位，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 24.7%，美国人均水平的 24.4%，加拿大人均水平的 4.27%；现在我国农村有 8000 万人口和 6000 万头牲畜缺少饮用水在半年以上，300 个城市处于贫水状态，其中 108 个城市严重缺水。淡水资源的短缺给人民生活 and 城乡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于生态平衡也十分不利。

其五，人口增加，给各种能源也带来很大压力。本来我国的煤、电、原油、天然气总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但按人均产量一算就退居到世界排行榜的 120 位以后。现在人均能源产量（按标准煤计算）我国只有 0.77 吨，只及世界人均产量的 35%，只及加拿大人均产量的 6.49%。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将给能源以及与其生产开发相联系的环境净化造成更大的压力。

最后，人口的增多，迫使经济活动不合理性加剧，生活污物排放也在增大，“三废”日增、酸雨降临、水体污染，使生态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在一些地方接近极限，在另一些地方超负荷运转，态势极为严峻。

让我们庆幸的是，马寅初先生控制人口的主张没有被长期束之高阁，在《新人口论》发表 15 年后的 70 年代初期，我国开始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工作，力度逐步加大、范围越来越广，宣传教育也越来越深入，并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立为基本国策，使我国的 12 亿人口日推迟 9 年到来。这是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它不仅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也有重大的人口生态效益和人口环境效益。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就是为保护生态环境出了大力，做出了贡献。控降的幅度越大，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贡献也就越大。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就是绿色革命的主张，也就是维护人口与生态平衡的主张。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把马寅初的

《新人口论》纳为《绿色经典文库》是理所当然的，当之无愧的。

我国的现有人口已达 12.2 亿，人口基数是庞大的。由于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就是我们的总和生育率控制在更替水平以下，人口总量还要持续增长一段时间，大体达到 16 亿左右才会静止下来。所以，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有进一步尖锐的趋势。这是客观现实，我们要正视。不从实际出发、视而不见，对严峻的现实掉以轻心的盲目乐观态度固然是要不得的，而那种把它看得过重，认为大势已去，现在已无法收拾，“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悲观论调也是不必要的。我们主张：从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实际出发，采取科学的积极的治理方针，落实两个基本国策，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逐步使人口与生态环境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我们相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1997 年 9 月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和正确的领导，人口的控制已有了办法。1957年10月26日发表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第三项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我深信有了这一项规定，5亿农民中多子多孙的思想，一定可以很快地扭转过来。

我国农村过去长期存在着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这个矛盾经过了解放战争胜利和土地改革完成，已经解决了。土改之后，农村中出现了新矛盾，这就是个体农民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矛盾。经过了几年来的斗争和艰苦工作，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中国农民肯定地走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两条道路的矛盾。那么现在还有没有矛盾呢？矛盾是有的，除了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外，我认为人口多、资金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矛盾。过去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现在的矛盾主要的是生产矛盾。

一 我国人口增殖太快

1953年的普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表明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一共有601938035人，这是一个静态的记录，如果五三年以后每年都有人口统计数字，这样就成为动态的人口记录。可惜的是这些数字现在没有，今后必须建立生命统计，登记各个区域人口出生、死亡、结婚、离婚、迁入、迁出的人数，这样才有正确的人口统计。现在一般估计中国人口大概每年增加1200万到1300万，增殖率20‰，如果这样估计下去，30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增殖率20‰是怎样得来的呢？1953年政府在29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其余各省每省选10个县进行普查，另有35个县只查一区、两镇、58个乡、9个村，共有人口3018万人，出生率37‰、死亡率17‰。因此人口增殖率为20‰，并且说城市的增殖率高于乡村。上海一地的增殖率是39‰，城乡平均起来每年增加20‰。我很怀疑四年来增殖率是否仍旧是20‰呢？普查的数字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拿20‰来解释以后四年的情况（自1953至1957），恐怕有出入。由于以下七方面的考虑，我认为增殖率或超过20‰：（一）结婚人数增加，在解放以前青年人毕业即失业；现在毕业以后，国家分配工作，经济情况改善就具备了组成家庭的条件。社会上大家都有职业，对于父兄、亲友的接济少了，负担减轻，也促使结婚人数增加，并且政府照顾已婚夫妇，原则上分配

在一个城市内工作，生育的机会也就增加了。（二）政府对于孕妇产妇和婴儿的福利照顾，产妇产前产后有 56 天的休假，这在解放前是没有的。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乡村中产婆接生已为正规接生所代替，婴儿死亡率下降，托儿机构普遍建立，可替多子女的家庭进行一部分教养儿童工作，子女入学可以享受公费待遇。（三）老年人死亡率减少了，以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人生七十多来兮。对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顾，退休有养老金，真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四）以往几乎年年有内战，人民遭受兵燹、水旱灾害，流离失所，大量死亡。现在国内秩序空前安定，内战消灭、盗匪绝迹、凶杀案件减少，人民死于非命的减少。（五）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尼姑与和尚大半还俗结婚，将来和尚和尼姑的人数也不会多。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解决的娼妓问题，我们也彻底解决了。大家都知道妓女因丈夫太多，是不能生育的。（六）农业合作化以后，人民生活改善，老年人尚有旧思想的残余，希望多福多寿，什么五世其昌、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种种格言，到处传播。只要经济上许可，就忙着替儿子娶媳妇，成家立业。（七）政府对于一胎多婴的家庭，除了奖励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补助。诸如此类，都是增加出生率，减少死亡率的因素。因此，我认为近四年来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 20% 以上。

二 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

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我们的资金积累较多，分配得当，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会较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就能够按比例发展……国民收入是全国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物质财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全部国民收入都归劳动人民自己所有。劳动人民把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部分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用做积累。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

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一定要增加国民收入。我国的国民收入在 1956 年将近 900 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 79%，积累部分约为 21%。因人口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产部门之中，觉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

三 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

我到浙江视察三次，旧时代的浙江，分成 11 个府，我到了 10 个府。令人注目的是这些地方儿童特别多，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每到一个村必定向社里的负责干部和老农了解近年来村里出生的人口有多少，死亡的有多少，生死相抵以后，净增加有多少。各地人口增殖的情况虽不一样，我的印象是顶少的也增殖了 22‰以上；到上海视察时，感觉到增殖率更高。1955 年视察返京以后，就视察所得准备好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稿，内容是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打算在 1955 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提出以前先在浙江小组进行讨论，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法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今年 2 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地提到人口问题，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我就把旧发言稿在扩大最高国务会议上简略地讲了一遍。现在就把这篇稿子加以补充，提出来请各位代表指教。

四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大家都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学说是反动的。马尔萨斯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即由一增加到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而食物是按算术级数增加如一、二、三、四、五、六、七……；过了几代，人口增加太多，粮食不够吃了，因此产生疾病、瘟疫，甚至战争，人民大批死亡，人口锐减，至此人口数量才能与粮食供应相平衡。这样，世界经常处于恶性循环中，人类的前途非常黯淡。马尔萨斯“人口论”于 1798 年出版，当时正值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工人们大量失业、普遍贫穷、时有暴动，人民对于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很大的不满。马尔萨斯写“人口论”的本意，就在于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府，掩盖英国政府的错误措施。他的人口理论无异乎告诉工人们说，工人们的普遍贫困，不是政府之过，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加太快而粮食增加太慢引起的。这种论调是他“人口论”的出发点，也就在这一点上他根本错误了。当时法国拿破仑在欧洲挑起了大战，人民死得很多，粮食不足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因而大家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很正确。但是拿破仑战争以后，他的学说应用到德国的情况上，就不符合实际了。由于当时德国科学研究的发展，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要快，他的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的理论基础就此破产。马尔萨斯没有想到以后的科学研究能够飞跃地发展，使得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并且比人口增加得更快。应该了解，土地和劳动力这些自然条件，虽是农业生产最根本的条件，但它们在发展生产上是有一定限制的，而科学

的发展则是无止境的。科学愈发达，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愈加提高。知识增加，一方面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减低，例如社会上层分子和脑力劳动者，娱乐的方式较多，如打球、划船、骑马、打猎等多方面的活动，减低了他们的性欲。在法国，上层分子的生殖率停滞不变，他们把生儿育女看做包袱。又如约翰雷指出，夏威夷群岛的土地非常肥沃，食品有大量的增加，但人口并不跟着增加，主要是因为该处的居民并不是喜欢多子多孙的，这又有力地反驳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因此他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理论也就此破了产。

五 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让我用中国的实际情形来说明这个不同之点。

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仓库最近正式投入生产。这座仓库高达 35 公尺，有 24 个圆仓和 12 个星形粮仓，能够储放 7 万吨粮食。粮仓的一端，有一个 60 公尺高的工作塔，粮食用火车运来后，卸车、运送、滤尘、筛选、计量、测温等都是用工作塔里机械操作，自动电铲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一车厢粮食卸完。粮仓里设有电阻温度计，化验工人在地下工作室里就能通过自动测温仪表箱准确地测量每个粮仓里的温度。发现仓里温度高，把电钮打开，在 6 天内就能把 7 万吨粮食全部进行一次通风。如果用人工翻晒这些粮食，需要 300 个劳动力连续晒一年半才能晒完。这座机械化仓库是为石家庄食品制造工业储藏原料建设的，对保证产品质量有很大作用（根据 1957 年 5 月 10 日《大公报》）。关于粮仓问题我曾与粮食部的负责人谈过，知道粮食集中在政府手中者今年约有 1000 亿斤左右（包括农业税和征购之数），此外尚须加上 200 亿斤从上年留下来的，约共 1200 亿斤。1 亿斤等于 5 万吨，共等于 6000 万吨。若这个数量的粮食，皆用机械化仓库来储藏，共需建筑 857 座，每座建设费约在 300 万元左右，共需 2.5 亿万元。但实际上每座粮仓的利用率不过 60~70%。因为年岁有丰歉之别，丰收时，收集的粮食可以堆满仓库，但歉收时，或只能利用 60~70%。因此我们要建设可以容纳 1 亿吨粮食的仓库 1428 座，共需投资 42.8 亿元。试问资金在哪里？有了资金，钢铁、水泥、木材在哪里？

假定每座仓库需用 300 个劳动力（旧式仓库的一个保管员只管 50 万斤），共需用 42.84 万人，尚且要花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晒完。而现在每座只需 15 个技工在 6 天内就能把 7 万吨粮食进行一次通风。就是只要原来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就可完成任务了，其余二十分之十九的人是多余的。因为这 15 个技工的工作效率高，所以他们的平均工资是 80 元；因为工资高，所以购买力大，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提高，社会主义的目的可以达到。但我们要注意的，其余那二十分之十九的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呢？在目前

6.4 亿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 1300 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

据上海国棉二厂负责人楼葆华先生的厂矿调查报告（载 1957 年 10 月 9 日《人民日报》），从 1953 年到 1957 年 7 月，上海国棉二厂全厂女工已生了 3049 个小孩，差不多等于全厂现有的女工总数。1956 年和解放前的 1946 年相比，生育率几乎增加三倍左右。女工的生育率高了，另一方面婴儿的死亡率却降低了。解放前，儿童死于麻疹、白喉、天花、痢疾、百日咳的很多，而今天，儿童死于这些疾病仅仅是个别的了。由于女职工的生育率太高，就产生了下列几种不良的现象：（1）产生了或扩大了房子不够住、或生活困难的问题，至少是影响了生活的改善。仅以工人住宅的拥挤现象来说，平均每间房子都有 5 人左右。目前因家庭人口多而申请要房的占全部要房子的人的 40~50%；（2）从 1957 年 1 月到 6 月，全厂因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需要补助的职工有 414 人，占被补助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3）因妇科疾病而造成的缺勤率，1956 年有 6842 个工作日，在造成缺勤率的各科疾病中占第一位；（4）有些职工由于生育多，家务操作繁忙，生活不好、营养不良，影响了身体的健康；（5）有些女工因子女多无法学习文化；（6）有的青年女工因生了孩子，忙于家务，降低了政治进取心。

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 1000 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50 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 950 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我们现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要多搞中、小型工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小型工业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 7 册第 151 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有人称我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今年增加的 1300 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 100 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 1200 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但今日的农民，每人每年为国家所创造的财富，至多不过 80 万元，而工厂中的工人因有新式的技术装备，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 4000 多元的财富。二个生产率的对比如一与五十之比（详见说明——本书第 22 页附表一），二者的生产率相差如此之巨，主要原因是工业生产能利用新式技术装备（有些是最新式的），而农业生产只能利用畜力为主要动力，加以近来有些省份牲畜瘦弱死亡不少，致有用人力拉犁来耕地的现象，更影响到农业生产。且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有二个条件，一是水、二是肥，必须有水，施肥才有用。如果没有水利设备，遇到旱灾或者水灾，再多肥料也不能希望增产。北方农民缺乏积肥习惯，与水利条件太差是有关系的。我国技术工程落后，对于水旱灾害尚无控制把握，

同时因工业落后，国家尚不能供应大量化肥。凡此皆是工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我说这些话，工人方面或可能发生一种错觉，误认为他们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多，他们的功劳大，因而要求增加工资，殊不知很多工业部门的生产资料是由农业部门创造的，他们的货币积累一部分是由其他部门造成的，不过制造的最后阶段落在他们的部门之内，因而最后的结果在他们的部门内体现出来而已。

若进一步把以上所述的100万工人和在乡村中安插的1200万农民合并计算，则每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一定低得可怜，问题是如何提高这1200万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若要提高，非把农业电气化、机械化不可，非大大地增加化学肥料不可。但资金在哪里？积累在哪里？有了积累，物资如钢材、水泥等在哪里？洪水为患自古已然，于今尤烈，1954年的洪水，可以作证。于是我想到要解除农民被洪水淹没的损失和淹死的危险，最好能在三峡兴建一个能够防御千年一遇的大洪水的水库，从此一劳永逸，可以使农民高枕无忧。明知投资数目不小，工程浩大，长江上游淹没损失也可观，但从国家和农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还是合算的。据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总工程师陆钦侃先生的估计，三峡工程造价达100余亿元；为配合这样大的电能，还要建设相应的工厂企业来充分利用。它们的造价（投资）要达五六百亿到1000亿元。哪里来这许多钱？有了钱，哪里来这许多钢材和水泥？况工程浩大，20年内恐不能完成修建。一旦完成之后，农民不知要得到多少好处。不但水利建设、电力建设会把农村全面改观，即机械、肥料、运输、燃料以及建筑材料等等亦将大量出现于农村，为农业服务；农村将成为重工业的重要市场，不过今日尚须耐心等待一个时期。这个等待，是指像三峡这样的巨大工程而言。但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关系变了，生产力正在猛力地向前发展着，对农业小型机械化问题，必须快快有积极的准备。目前农村中的关键问题，是忙闲不均的问题，如南方推行双季稻，在割早稻后即种晚稻的15天内，农民实在是忙不过来，所以今后农村富裕增产的关键，在于农忙忙不过来的时候有机机械来帮忙。农民所最需要的机械是：一割稻机，二插秧机，三抽水机。

我在上面说过，我们的缺点是消费多、积累少。1956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将近900亿元，其中消费占79%，而积累只占21%，亦即等于80多亿元。这笔资金要分摊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包括对外贸易业）这许多单位之中，每个单位分到的，为数极微，当然不能大踏步地前进。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我们不屑向美国借款，我们亦不能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方法来榨取资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赔款作为工业化的本钱；我们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积累。但自身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79%与21%之比，可否把消费减少一些，把积累增加一些呢？一看我国实际情况，这是带有危险性的。

我们的国民收入只有这一点，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积累多了，消费

就少了，对于人民的生活，难免照顾得不够。反之，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了，就必然推迟工业化的完成，故二者之间必须求得一个平衡。至于如何平衡，要看实际情况。在苏联，消费占 75%，而积累占 25%，即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在中国，由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人口较多，消费比重当然要高一些，所以有 79% 与 21% 之比。我们不能如苏联一样把积累提高到 25%，把消费压低到 75%，那就等于说我们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了，不免会出乱子。我们现在把每年增殖出来的 1200 万多余人口放在农村。虽然出于不得已，但难免发生副作用。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用。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但每年还要增殖出来 1300 万人，除在工业部门安置 100 万人外，要把其余 1200 万人口安置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因此，我主张要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要控制人口。不然的话，徒劳无功。

我说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我所指的恩德是：在土改胜利之后，3 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了 7 亿亩的土地，并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租粮 600 亿斤及各种超出任务的剥削。土改后，从 1950 年到 1956 年七年中，国家对水利的基本建设拨款共达 30.7 亿多元，发放救灾救济经费 13.1 亿多元，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及防治病虫害的经费 12.8 亿多元。以上三项共 50.6 亿多元。此外农民在七年中得到国家 80 亿元的低利贷款，从此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此外，今天即使最贫穷的农民亦不致卖男卖女，挨饿受冻，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他们在农业社的照顾下，都能生活下去，此外在农村中还实行了五保制，使老有所恃。我的意思是，政府对人口问题若不再设法控制，这些恩德不免一变而为失望与不满。

六 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

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的五年计划的次数愈多，生产率也就愈大，而所需的技术装备也就愈精。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一个工人配备的资金，是固定基金 1 万卢布、流动基金 3000 卢布，共计 1.3 万个卢布。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每个工人配备的资金六倍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所配备的资金，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配备的资金即达 12 倍。所以苏联生产能力的继续增长，是由于每年技术装备的倍数增加。中国以后的情况也应该这样，因此要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要大力积累资金，加强每个工人的技术装备，同时还要控制人口，因为如人口增殖任其自流，资金很难迅速地积累。积累资金最快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工人的收

入也当然提高，如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能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例地提高，二者收入的差别愈来愈大，就影响着工农联盟。因此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

以上已说过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一个工人配备的资金是固定基金 1 万卢布，流动资金 3000 卢布。我国自 1953 年至 1955 年，国营、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工业每个工人装备的生产用的固定资产为 1953 年 5273 元，1954 年 6072 元，1955 年 6835 元。一个卢布约等于人民币五角，中苏两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给工人的技术装备大致相等（附表二，见本书 25 页）。

七 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我们要积累资金，最好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特点是投资少、建设易、获利多而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积累资金，用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现在新建一个 10 万纱锭、3500 台布机的棉纺织厂，共需投资 3500 万元。在正式投入生产以后，只要一年时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包括工业、商业利润和税收）。印染、毛纺织厂等收回的时间还要快一些。因此轻工业的扩大，不仅不会影响重工业的建设，而且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

但扩大轻工业的建设，必须在资金和原料足够的条件下进行，因此我们要谈一谈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轻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农业，我们要建设棉纺织业，一定要向农业取得棉花；要发展丝纺织业，一定要向农业取得蚕茧；要发展制油厂，一定要取得大豆、花生、芝麻、油菜籽等等；要发展制糖厂，一定要取得甘蔗和甜菜；要发展毛织业，一定要取得羊毛。今日油、糖、布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它们的紧张情况，超过粮食。要增加这些物品的供应，一定要扩大棉花、蚕桑、大豆、花生、芝麻、甘蔗、甜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这不得不缩小了生产粮食的种植面积，而粮食产量就要受到了影响。所以各种经济作物与粮食互争土地，二者之间一定要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若人口无限增殖，这一适当平衡将更被破坏；因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工业，间接影响到重工业。因此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

现在食糖异常缺少，紧张情况，不亚于食油。若扩大种植甜菜的面积，不啻与粮食争地。吉林省境内的新中国制糖厂和范家屯糖厂的甜菜原料，主要依靠中部地区的榆树、怀德、九台、德惠等县供应。但是这些县份又是吉林省出产粮食和大豆最多的县份。如果在这里大量发展甜菜生产，就会削减粮食和大豆的播种面积。同时，因为土地少，不能进行合理轮作，反而会影响到甜菜产量和质量提高。如 1953 年甜菜每公顷产量为 2.4 万斤左右，含糖率平均占 14.3%，到 1955 年每公顷甜菜产量就降低到 1.8 万斤，含糖率平均只达到 11.4%。像这样发展下去，制糖工业只有退缩，不能前进。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重工业与轻工业间的关系，还不如重工

业与农业间的关系之为密切。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如农业不能很快地发展，难望重工业可以大踏步地前进。今年紧张情况的解除，其希望悬于秋季之大丰收。

我国各项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好多是从国外输入的，但要进口多少重工业物资，得先看出口多少农业和轻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由于我国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的原料，大约有 90% 以上要依靠农业，故农业的扩大或缩小，丰收或歉收，对重工业或工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若人口的增殖听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

据对外贸易部叶季壮部长的发言（在人大第四次会议上），1957 年计划进出口贸易总额 99.55 亿元，比上年实绩减少 8.4%，其中进口 47.55 亿元，比上年实绩减少 10.2%；出口 52 亿元，比上年实绩减少 6.6%。这是因为 1956 年某些地区农业因灾减产，出口物资供应比较困难。但主要原因是过去几年在我国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约占 75% 左右，矿产和机械等工业品约占 25%。由于目前农业增产的速度受着耕地面积的限制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同时由于人民对轻工业品的需要逐步提高，若干种商品的出口势非减少不可，以适应国内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但由于增加了矿产品、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各种小土产的出口，今年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出口额，能够适当地进口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设备。但无论如何，由于进出口贸易的减少，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

八 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20 世纪根本的社会变化和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它们之间有着内部的必然的联系，因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它们的共同基础。航空、无线电技术和遥控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原子能的发现，没有现代的强大工业是不可能的。不必说别的，就如不锈钢我们自己不能制造，苏联也不多，向其他国家去买也是很困难。我们在四川新建的化肥厂，还不能解决它的不锈钢问题。建设一个化肥厂，从设计、建筑、安装到开工，大体也要五六年，一般讲来，应该建筑在工业化有了基础的国家，甚至于有高度工业化基础的国家，才能大量发展肥料工厂，因为技术比较高，用的材料也比较高。这个增长了的生产力，乃是深刻的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俟科学发展之后又回过头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好，会使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到提高。从实践提高到理论，再用理论来进一步指导实践。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是科学工作者的准绳，也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唯一途径。中国科学院工作报告草案，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它的较有基础部分和不足部分的状况。例如得奖的论著主要属于我国目前基础较好的学科；一些新兴的学科，特别是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所急需的几种学科，得奖的论著很少。这正是过去历史

情况的真实反映，可以唤起科学界的注意，“正确地更多地转移力量于急需的薄弱方面”。但同时如果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继续向前推进，自然而然会促进本门内的科学研究，有重点地建立新机构并充实研究力量。以技术科学的研究工作而论，所谓技术科学的研究工作，就是对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解答，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考验。现在有许多地方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一大批有关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要求农业科学研究机关予以解答，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而研究工作者在解答农业生产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科学技术问题时，找到了新资料。这些新资料是新理论最丰富的源泉。脱离实际来谈技术科学研究，是不能想象的。我们要使中国的科学赶上世界水平，只有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才能达到。我们不能把科学研究分成理论和应用两部分，因为所谓理论就是为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解答的理论，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过去苏联科学院曾经做过这样的划分，现在知其不恰当，已把它去掉了。此外，科学研究，一定要在生产要求的压力下，才能加速推进。如我们的生产部门不能在12年内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而独要督促研究部门单刀匹马、长驱直入，无异缘木求鱼。周总理在1957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向科学进军一节中亦说：“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做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部门向科学研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科学家在这方面就有了充分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由此观之，我们必须首先推进产业部门的技术装备，从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才能奠定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现在我国科学工作的条件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受现有工业水平和国家财力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满足开展研究的要求。欲达到这个目的，唯有加速积累资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

此后我国的科学研究力量大部分放在科学院、227所高等学校和许许多多产业部门，它们不仅集中了大批科学研究人材，并且它们研究的方面很多，又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这对于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同时为了支援新建的工业地区和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科学文化建设，也需要在这些地区建立新的高等学校和新的科学研究机构，需要一些科学家“离开原来的研究环境”到这些地方去工作。在初到新的研究环境时，研究工作暂时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但从长远看来，这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好处是很大的。因为每门科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某门科学愈向前进，就愈需要其它有关科学的配合（近代科学的特点是各门科学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十分密切。国家建设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也往往要由许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在科学的许多重要方面进行着研究工作）。例如人造卫星的制造和发射是一件很复杂的综合性的科学工作，牵涉到火箭技术、冶金、机械、天文、

数学、物理、化学、气象、地球物理、大地测量、无线电电子学等方面。再以国际地球物理年为例，为什么各国科学家可以自今年（1957年）7月1日起举行国际地球物理年？其中理由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和工程技术上的进步异常迅速，无线电物理和火箭方面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使得人们对高空测量有了很好的工具，他们可以利用这方面的新成就对地球进行观测，从而可知没有无线电物理和火箭方面的科学研究的配合，对地球进行观测，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求所有有关生产部门都能按平衡原则向前推进。这有待于更多资金的积累和人口的严格控制。

九 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关于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因限于篇幅，不愿在这里多谈，拟另作一文专论之。在这里，我只说我国地少人多，全国6.4亿人口，每人平均分不到三亩地。虽有人说我国有15亿亩荒地，但这些荒地有的是石山，有的是没有水源的，有的是少数民族世代代借以为生的草原地，根本不能开垦的；到底有多少荒地可以开垦，迄今无确实统计，加以工业落后，财力有限，一时尚不能大规模进行垦荒。虽然在1953年至1956年之间，每年开垦了1400多万亩荒地，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1953年的二亩八分降至1955年二亩七分。况自然灾害影响着农业生产，使农民的收入极不稳定。如江苏省在1955年每户农民平均收入是306元（这是抽查的材料，不能完全代表江苏省全部情况），假定一户四口，每口不过分到76元5角。该省1956年遇到灾害，全省农民平均收入每人下降到49元9角。农民收入之不稳定如此，要完全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必需多兴办像三门峡这样的大水利工程，这有待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行，尤有待于资金的多多积累。故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通通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主席这些话是从他心中说出来的，这是全国人民之福。倘能把人口控制起来，这个崇高的愿望，不难成为事实。

十 几点建议

（一）1953年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使我们对于全国人口按性别划分，按年龄组别划分，按民族构成划分和按城镇与乡村划分，都能够明白它们的对比和真相，这是很好的；但要实施明健的人口政策，和帮助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还必须认真举办关于人口动态的统计，如出生、死亡、结婚、

离婚和迁徙等都应有完整的统计公布。因此我建议 在 1958 年至迟在 1963 年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五年中或这十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

（二）我们在上面已谈到夏威夷群岛的人口并不跟着食品的增加而增加，主要原因是因为该处的居民不是喜欢多子多孙的。但在中国情形适相反，宗嗣继承观念太深，只要生活好一些，便想娶女子，便患无后代，便畏出远门，便安土重迁。加以种种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如“早生贵子”、“儿孙满堂”、“五世同堂”、“五世其昌”、“多福多寿多男子”等等，支配着他们的行动，所以在妇女心理中，以生子为天职，以不育为大耻；在父母心理中，嫌儿媳不生育，重婚纳妾，理所当然。但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明知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大概男子 25 岁、女子 23 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但暂时不考虑修改婚姻法，理由是把结婚年龄提高，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是由于节制生育的宣传教育还做得不够，农村中老少男女还没有普遍明白节制生育的理由和需要，操之过急不免发生副作用，恐农村中的青年男女怕婚姻法修改后提高结婚年龄，影响他们的结婚，不免发生争先恐后结婚的情况。俟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亦未为晚。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照目前的计算，国家在每个孩子的教育及就业装备上要支出一万元上下。一般人往往不够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况控制人口，为的是要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能过更快乐更美丽的生活。

（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就有生命权，除非母亲身体不好，一般不能这样做；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我有几个亲戚身体本来很好，刮了子宫后不是生这样病，就生那样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年轻的妇女们就会不关心避孕，把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据北京几位名医谈话，有些人刚做过人工流产，很快又怀孕，又跑到医院里去吵闹，主要原因是依赖人工流产，不认真避孕了，尤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不积极，只图自己一时的快乐，不顾女子长期的痛苦，实在太不公平；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苏联人口只有两亿，而医生有 35 万之多，病床有 135.4 万张，我国人口大于苏联三倍以上，而能做人工手术的恐怕不到六万人，医院情况已经很紧张，若再把人工流产的任务加在他们的身上，深恐耽误其他的治疗工作。因此，我诚恳地请卫生部好好地考虑。

说明

附表一

农民每人每年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一) 农民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1953年	1956年
1. 按农业总产值计算：		
农业总产值（按 1952 年不变价格，亿元）	499.1580.3	
每人平均（元）	102.8112.2	
2. 按农业净产值计算：		
农业净产值（按 1952 年不变价格，亿元）	369.5426.9	
每人平均（元）	76.182.5	
3. 按农民直接向国家缴纳的部分计算：		
农民直接缴纳部分（农业税及附加、公债，亿元）	27.137.3	
每人平均（元）	5.67.2	
(二) 农民人口数（万人）	48	54651723

[说明]

1. 农业总产值和净产值均系用计算国民收入时所用数字，农业总产值比现在预计数约大 5000 万元是为了和农业净产值口径取得一致。

2. 农民人口数系全年平均人数。这个数字比谭震林同志在《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一文（见《人民日报》5月5日第三版）所引 5.28 亿人为小。

3. 1953 年农民直接向国家缴纳的部分只包括农业税一项，1956 年除农业税外尚有农业税附加 2.59 亿元和公债 1.38 亿元。

工人每人每年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指标	计算单位	1953年	1956年
(一) 工业生产的全部价值计算			
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的全部工业)			
	千元	35576744	57136410
生产人员数			
全部生产人员	万人	505.28	646.788
生产工人	万人	419.5	459.76

每人平均创造价值			
每一生产人员平均 元		7041	8834
创造价值			
每一生产工人平均 元		8481	12427
创造价值			
(二)工业生产的新			
创造价值计算			
工业净产值(不包括千元		11572291	19567090
手工业全部工业)			
生产人员数			
全部生产人员 万人		505.28	646.788
生产工人 万人		419.5	459.76
每人平均创造的新			
价值			
每一生产人员平均 元		2290	3025
创造的新价值			
每一生产工人平均 元		2759	4256
创造的新价值			

〔说明〕

1. 工业总产值是按 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 不包括手工业产值。这个总产值数字预计较早, 因此小于做 1957 年计划的预计数和统计公报数, 但计算国民收入时却是按这个预计数计算的, 所以仍列此数。如果按照 1957 年计划上的 1956 年预计数 5758963.3 万元计算, 则每一生产人员平均创造价值为 8904 元, 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价值为 12526 元。

2. 工业净产值按 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 不包括手工业净产值。但国民收入计算时间较早, 其 1956 年总产值系预计数, 小于做 1957 年计划时的 1956 年预计数, 并且比实际数亦小。

3. 生产工人数 1953 年按国家统计局年报数, 其中国营、公私合营, 系年平均数, 合作社营和私营由于没有统计年平均人数, 故采用了年末到达数。1956 年按 1957 年计划时的预计数。

4. 全部生产人员 1953 年按国家统计局研究室的材料, 1953 年全部工业生产人员年平均人数为 5052816 人 (不包括工业企业附属单位人员)。1956 年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人员每人生产的价值按 1957 年计划上 1956 年预计数, 私营系按照上述经济类型的材料, 加以估算而得。

〔注〕表内最后一项数字 (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的新价值 4256 元), 是已经把重复部分扣除后计算出来的。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

现代工业的构成是异常复杂的, 每种产品的零件, 部件常须经由许多地

区，许多行业，许多工厂，才能拼凑成功。从原料到成品经过逐步加工有无数次的工序，先把原料成为若干中间产品，最后才叫做成品。中间产品具有二重性，就制造它的工厂说是成品，就采用它的厂矿说都是原料。还有更复杂的，例如煤炭，既是煤矿的成品，又是工业的原料，同时又是家庭用的消费资料。因许多产品都有两重性，计算总产值时就发生很大的矛盾。若把中间产品的价值，统计进去，就一定会发生重复，甚至重复至数次以上，以致总产值失去了真实。因此，我们要把中间产品严格地区分开来，不然的话，计算出来的净产值就会偏高，不能真实代表国民所得。

附表二

1953—55 年国营、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工业 每个工人装备的生产用固定资产

单位：元

部门	1953 年	1954 年	1955 年
总计	5273	6072	6835
电力部门	51197	58828	58196
燃料采掘部门	5021	5574	6020
铁矿及锰矿部门	1887	4407	4057
化学矿开采部门	828	939	949
其他非金属矿开采	952	1128	3599
部门			
森林采伐部门	497	1443	2931
燃料加工部门	18307	18643	16248
钢铁冶炼部门	10151	12385	14411
有色金属开采及冶	3362	5684	6480
炼部门			
金属加工部门	5029	5528	6035
化学加工部门	9066	9867	11114
建筑材料部门	2291	2531	3641
玻璃工业部门	4273	3431	3502
陶瓷工业部门	2456	1925	1482
橡胶加工部门	4714	4372	10688
木材加工部门	1210	1480	1945
火柴工业部门	466	440	449
造纸工业部门	8923	9856	10307
纺织工业部门	4943	5125	5107
缝纫部门	943	1124	1292

皮革及皮毛部门	1750	2080	2471
油脂、肥皂、香料、	6000	6090	6107
化妆品部门			
食品工业部门	3373	3312	3566
食盐部门	3653	3431	3307
印刷部门	3072	3240	3256
文化、教育、科学	1558	1755	6292
艺术用品部门			
自来水部门	49129	54743	59557
其他工业部门	4530	7087	8973

〔注一〕固定资产系指生产设备厂房及一切生产用土地；工人系指直接生产工人和辅助工人（如企业内部的搬运工人、仓库的装卸工人），不包括工程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及其他非生产人员。

1956年由于材料缺乏，还不能计算。

〔注二〕以上两表是请国家经济委员会同志们代制的，特此道谢。

此文原载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1958年收入《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时，作者曾稍做补充

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

现在我们人民内部矛盾很多，党与非党之间有矛盾，群众与领导有矛盾，群众与群众之间有矛盾，政府各部门之间也有矛盾，连我们小小的北京大学矛盾也是很多。这些矛盾我都不谈，我只谈今日中国的大矛盾。这就是生产力落后。这是一个主要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了，别的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不过要解决这个矛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需要长期努力才行。

这里，我要着重谈谈中国人口问题，这个矛盾与前面讲的那个主要矛盾关系很大。我们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发展生产力，高速度地工业化。要高速度工业化就需要大量资金。资金从何而来？资金主要从国民收入中积累而来。但是，我国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6亿多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因此，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就会感到人口问题十分严重。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才知道我国人口已超过6万万，四年来又至少增加了5000万。我大概算了一下，如以净增加率2%计算，15年后将达8亿，50年后将达16亿；如以3%计算，15年后将达9.3亿，50年后将达26亿。到那时候，超过今日世界的人口。我说的3%的净增加率，估计并不算高，可能还保守一点。我的理由是：第一，几年来一般职业稳定了，年轻人一有职业就考虑结婚；第二，孕妇、产妇、儿童有许多优待，乡村都有新法接生，小孩死的少了；第三，生活逐步提高，医疗卫生大有进步，一般死亡率降低了；第四，人的寿命不断增长，苏联人的寿命30多年来已提高一倍，平均达到60几岁；我国有句古话：“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后恐怕是“人生七十多来兮”了；第五，全国解放后，和平统一了，不打仗，要少死许多人；第六，社会根本变了，尼姑、和尚也结婚了，妓女也没有了，多了许多生孩子的人。农村合作化后，生活好转，父母要为儿女成亲。因此，我敢说，我估计3%的净增加率还是保守。这个数字，说明我国人口问题将愈来愈严重，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非计划生育不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毛主席说得对：“一切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而且还要有人口动态统计，否则人口统计不正确，所定的计划一定会被打乱，结果计划一定会落空，久而久之，就会出问题。

还有，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1000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一个人就可以做了，请问其余999人怎么办？因此，我们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自动化，我们现在不能多搞最大的工厂，要多搞中、小型工厂，就是因为中小型工厂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七册第151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却拖住了

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有人说，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人人可以减少劳动时间，每天可以劳动四小时甚至二小时，其余的时间用来学文化，求知识。这种想法是好的，但试问几万万入学文化，纸在哪里？校舍在哪里？教师在哪里？又有人说，我们还有 15 亿亩荒地可以开垦。这是事实。但是好多荒地缺少水源，有何用处？而且农业部所说的荒地据北大生物学专家李继侗教授的意见，全是少数民族世代代借以为生的草原地，绝大部分是不应开垦的。即能开垦，也需要拖拉机，拖拉机哪里来？有了拖拉机，汽油怎么办？就算有拖拉机和汽油，又怎样去？今日的铁路已很拥挤，如何运去？运去之后要筑公路，要有不知多少大卡车，谁去开荒？我们江浙人口稠密，可以去，但是不能一个人去，若带家眷去，开荒的地方就要先造好多房子，开商店、办学校、办医院，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大量开荒。要造大卡车、造房子、开商店、办学校、开医院，就需要大量钢材、木材、水泥，而这些物资，又是我国现在缺乏的东西。所以除非科学家能快快制造合成的食品，我们就不能摆脱耕地的束缚。

总之，唯一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怎样实行计划生育，最重要的是普遍推行避孕。人工流产我是不赞成的，一则因为这是杀生；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造成很大浪费。如果允许人工流产，年轻的夫妇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不去避孕。

关于提倡晚婚问题，我希望青年们不要视结婚为完全私人的事，我们正在养成集体生活的习惯，难道结婚不是集体生活的一部分吗？

每对夫妇生几个最合适？有人主张生三个。我认为两个就够了，男孩代替父亲，女孩代替母亲。我还主张两个有奖，三个有税，以税作奖，不会加重国家负担。

今年增加的 1300 万人口，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 100 万人（据李富春同志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的 1200 万人要下乡，但今日农民每人每年为国家所创造的财富包括农业税、公益金、公积金等在内，至多不过四五十元，而工厂中的工人因有新式的技术装备，每年至少可以为国家创造七八百元，若把 100 万工人和 1200 万农民合并计算，则每人平均劳动生产率一定很低，问题是在如何提高这 1200 万下乡的人民的的生产力。若要提高，非把农业电气化、机械化不可，非增加化学肥料不可。但资金在哪里？积累在哪里？去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将近 900 亿元，其中消费占 79%，积累只占 21%，即等于 180 多亿元，这笔资金要分摊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包括林牧渔）、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包括对外贸易）这许多单位之中，当然不能大踏步地前进。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快，要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间的矛盾”不亦难矣哉？因此我们非控制人口别无良图。

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点；近来他们对于生活逐渐

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多吃油，所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多穿，所以布不够；布不够，所以布票要折半使用。布票折半，老百姓相信共产党，没有意见。但是，这样的事不能多做，多做了不好。因此，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几百万人放在农村是出于不得已的办法，以后的情形还要严重。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

原载《大公报》1957年5月9日

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我向大会提出“新人口论”，其目的在于一面控制尚未出生之人口，一面提高现有人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今日的发言是上次提出的“新人口论”之继续。我只谈下列二点，就是：（一）节制生育；（二）文化技术下乡。

一年以来，党和政府在节制生育方面
做了不少工作，农民也开始逐步认识
到节育是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的

关于节制生育，党和政府在过去的一年中，直接地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所谓直接，是指取消军属多子女补助费一类措施而言；我所谓间接，是指最近热火朝天的兴修农田水利一类措施而言。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底，全国每天在水利工程战线上从事劳动的农民，自10月份二三千人，11月份的六七千人，又上升到今年1月份的1亿左右。按每人劳动120天计算，共有120亿个劳动日。以每个劳动日平均工资按6角计算，农民在水利工程上所投入的资金已有72亿元。现在人数还在增加，工作尚在进行。当然这72亿元所创造的财富当大大地超过此数，而且是无可估计的。这是直接的影响。这笔钱若不投入生产，而留在农民手中，不免用之于吃穿、婚丧、迷信、赌博等等，容易引起无计划的生育。这就是我所谓间接的工作。河南代表赵文甫先生在这次发言中指出，许多男女青年为了实现水利化，自愿推迟了结婚时间。辽宁省代表丘新野先生在发言中还说，打算在春节结婚的工人，纷纷给女方写信，推迟结婚期。这两位代表的发言，足以证明吾言之不误。所以我说关于节制生育一点，党和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直接地或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有一位研究东南亚国家人口问题的外国专家一日在和平大会讲演时由陈翰笙先生介绍他与我交谈，他对我说：“有的国家的人口问题比你们的严重得多，但政府对此漠不关心，不知将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你们的优点，是党政领袖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然的话只靠学者们口说笔写效果很小。祝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党和这样的一个政府。”我听了他的话之后，觉得他说出了我心中要说的话。不仅党和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地方和全国的人民代表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在今年1月5日、6日举行的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各种控制人口增长的办法，如大力提倡节育提倡晚婚等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有李永等八位代表提出修改婚姻法的结婚年龄案，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把这个提案交由常务委员会交法案委员会研究。法案委员会认为：“提倡晚婚的精神是好的，应当在群众中加强宣传教育，使群众自愿地推迟结婚年龄。”在群众不了解早婚的害处和迟婚的好处以前，结婚年龄现在可以不改。徒法不能以

自行，自古云然，所以，我认为法案委员会的意见是正确的。

党和政府已经着手做了，地方和全国人民代表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试问农民自己对这个问题如何看法？这个问题已经包含在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之中作为第二十九条。这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自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之后，在农村中已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已取得了不少的收获。比如四川省内江县双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就节制生育问题展开了大辩论，许多社员都认为今后应该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这次辩论是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引起的。社里粮食年年增产，可是有些社员粮食消费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社员在讨论中发现原来是人口增加太快，全社去年一年就增加 52 人，需要消费粮食 3.1 万多斤，要平均每亩多增产 27 斤才能够吃。但这里有早婚多生子的风气，这个问题过去并未引起大家注意。近几年，生活有了改善，这种风气更有了发展，许多人认为“早栽秧，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老年人鼓励儿女早婚，青年人也是刚满规定年龄就急忙结婚。政府宣传节制生育时，不少人思想有抵触。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还提出意见说：“政府连我们生多少娃娃也要管。”表示很不满意，后来这个社专门召开了节制生育问题的辩论会，辩论“节制生育到底好不好”。参加的人很踊跃。有人发言说：“娃娃多了，顾吃顾不到穿。前年入社，去年多分了 400 多斤粮食，可是添个娃娃就用得精光，现在还欠 30 多元债。娃娃多了，生活提不高，老婆和我吵过好多架。”在会上，大家都算起人口增加的细账来，算到后来都很吃惊。大家感到这样下去，一年要增产多少粮食才够吃？那还有多少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接着，全场你一句，我一句议论起孩子过多的坏处来。生过六个孩子的一个人说：“娃娃一多，照顾娃娃就照顾不了生产。有时候做活回来，娃娃没人照应跌得头破血流。去年我只做 200 多个工分，娃娃少的人却做了 1000 多个工分。”在会场上有些人还批评了“早生子早享福”的思想，理由是有了合作社，勤劳动就能改善生活，把合作社办好，比啥都可靠（意思就是不必一定要靠儿子）。全场的人都认为政府提倡节育正是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不过有些社员嫌避孕麻烦。经过争论，大家感到有点小麻烦，还是比生育过多带来大麻烦好。有些社员还建议在农村加强节育的宣传，改进避孕药物的供应工作，并希望医院能想出更简便更经济的避孕方法。

关于第二点“文化和技术下乡”，特提出下列两点意见：

农业生产经验非常丰富，总结这些农民自己创造的经验教育农民，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最好最快的方法。这是下放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甲) 以农民几千年来自己创造的经验来教育农民

这就需要调查整理祖国极其丰富的遗产。当前，凡具备体力劳动条件的机关青年和其他知识分子，很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乡、上山，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劳动中去，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成为具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做有文化的劳动者。鄙意以为乘这个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也可以开始引导农民做有劳动的文化者。据报载有的下放干部不甘落后，在劳动生产上还和社员展开竞赛，有的下放干部刚来不久就以劳动好而在全社全乡知了名。在农民方面也很关心他们的健康，总不肯让他们干重活，劝大家多休息。同时农民却也希望下乡干部，给他们搞一些脑力劳动，拿出一些文化和知识来，帮助他们做些扫盲工作，研究生产技术，讲解四十条纲要，编写简报，整理材料和调查研究。在知识分子方面，除劳动生产外，当然也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结合自己原来的业务，贡献出自己的文化和知识。这样就可以使大家更感到大有用武之地，自然也就解到在农村中生产工作的乐趣和前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搞好和群众的关系，才能在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这样知识分子就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农民群众也可以很快地成为有劳动的文化者，同时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界线逐步消灭。

为了提高农业科学水平，我们就要向外国的，特别是向苏联的先进农业科学学习。但是，农业是有地方性的，我们应该注意本国的特点。历代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斗争中，积累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和经验。距今 2200 年前的战国时代，在《吕氏春秋》的“辨土篇”中，对于庄稼的播种，已经做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可惜，战国时代的专门农书，多已失传，现在所保存者不过一些鳞爪而已。到了距今约 2000 年的汉朝，农书就有十几种之多，但除《泛胜之书》一书外，余皆失传。就是《泛胜之书》也只保存了一部分原文。此书是泛氏总结群众的经验而加以提高创造的一种成套的农田丰产技术专书，它所说的栽培法中，包括不少宝贵经验。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是《齐民要术》。这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 6 世纪 30 年代写成的，距今约 1420 多年。《齐民要术》后于《泛胜之书》500 多年，在这 500 多年中，我国农业又有了很大的进步，《齐民要术》能比较全面地加以总结。

但古代农书和医书比较，在写作范围上有很大的区别。掌握和不断改进农业技术的是劳动农民，但他们不能著书立说，不像医生那样能说能写。医生人数虽远不如农民之多，但他们写成很多医书，而且这些医书能够师徒相承，继续发展。虽古代医书亦不免有散失，但比较起来，还是少数。至于农书，劳动农民既不能自己动笔，写成农书的任务就落在少数研究农业的人身上。因此一般农书其数量远不及医书之多，何况农书又无师徒相传而得继续发展。此外，农书很少受到一般文人和藏书家的重视，尤易失传。不但汉以前的农书失传，唐朝几种重要农书也都没有一种保存下来。不特此也，农书的写作者既不是农民自己，则随时随地发生的先进经验亦不能由农民自己总

结记录下来。有些农业操作，虽有重要价值，但因语言隔阂、交通阻塞，传播不广，引不起文人的注意。因此农民的宝贵经验，能被总结而记录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只是世代流传在农民的实践中。我认为今日下乡的知识分子应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那些世代相传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在实践中所获得的成就。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万国鼎先生说：“农民实践中的先进经验是说不尽的，但是我们往往习见而不以为奇，而在国际友人看来却很宝贵。例如 1953 年保加利亚科学院植物栽培研究所所长达斯卡洛夫院士来我国考察，看到我国各地不同气候和地下的井窖贮藏，可使甘薯保持经年不坏。各种不同的井窖在保温通风等方面，都有轻而易举的方法。他认为这是十分可贵的经验。”“又如他在大连后牧村驿看到农民把白菜和韭菜间作防止白菜根腐病，认为这很合乎科学原理。他介绍苏联学者托金的研究，证明洋葱、蒜等根部分泌一种植物杀菌素，有杀菌作用。因此有些国际友人向我们建议，整理总结我国几千年来的农业经验，并且认为，这样必将有助于国际农业科学的进步。”因此总结和推广我们几千年来的农业经验，就今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的时候来讲，殊有必要。这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必修之课。说到这里，我想起几位下乡干部在报上的谈话。他们说：各种菜蔬有各种不同的掘法，挖菜窖时，究竟如何挖法？窖眼该挖在什么地方？什么方向？农民都有一套极其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限于文化，不能很好地总结，而《四十条纲要》中明白指示我们“由各省、市、自治区收集当地的丰产经验，编印成书，传播推广”。所以为农民总结经验，是下乡知识分子的分内事，也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最好最快的方法。这就是以农民几千年来自己创造的经验来教育农民。毛主席曾说过“年老体弱的可以不去农村工厂锻炼”。他大概是指体力劳动而言。写作是一种脑力劳动，年老体弱的知识分子亦可以做，发言人自己就抱有这样的志愿。

沁县解决工农业矛盾的经验说明，
应该重视发挥县营工业的积极性，
由县因地制宜组织当地群众的力量，
使地方工业更好地为农村经济服务

（乙）帮助农民向大自然进军

就今日科学落后的中国来谈，提高农村中的科学水平是很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先传播在农村中急迫需要的技术知识，并先提高技术水平。至于如何提高，我认为山西沁县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值得介绍和推广。事情是这样：农业生产的发展迫切需要工业的支援，但工业所供应的机械和物资非常昂贵，合作社无法筹措这么多钱。比如说：（一）大规模地普遍兴修农田水利，需要勘测地势的水平仪，筑拦河坝需要地质钻探，水库上需要高压水闸、冲沙闸、起闸机、拦鱼网等等。这些东西价格太高，一个水平仪要 400 多元，

请钻探机来钻一公尺要 200 元左右，而且经常排不上队。高压闸和起闸机等都要一千几百元，农业社很难筹到这笔钱，筹到钱也很难找到承制的单位。

（二）农业社所需要的化学肥料不仅数量太少，而且价钱也太贵。（三）农业社为节省人力、畜力所需要的简单机械和新式农具，农民既不会安装，亦不会使用，坏了亦不会修理，急需工业方面来援助，但工厂离得太远，人也少，无法满足这许多农业社的需要。这说明了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但学过辩证法的人相信在任何矛盾中包含着克服矛盾的因素，因此沁县本此信心找到了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

兴修水利钻探地势所需要的水平仪，由沁县联合加工厂（地方国营）根据水平仪的原理，仿效水平仪的模样，用当地能够找到的废铁玻璃等便宜材料，制造了一种简易水平仪，水平仪是由沁县中学校一位理化教员帮助设计的，并且由中学的化验室直接装置了玻璃圆筒；圆铁筒和木架子则是由铁业合作社和木业合作社的人们制造的。这个简易水平仪一部只花 13 元，不及大工厂水平仪价格的三十分之一。它当然有些缺点，它不能看得很远，但可以多分几段来勘测，功效尚好，若干县份已经向沁县购买。至于钻探机，联合加工厂也是用当地材料，试制了一种手摇的简单钻探机，一共能钻十公尺深，一次只能钻一公尺，拿出这一截来，看了再往下钻，当然增加了麻烦，但也能搞清楚十公尺内的地质情况，每一公尺的钻探费不过 3 角 8 分，不及大钻机钻价的五分之一。在同一方针下，这个厂自制了四吨重的高压水闸及同样能力的起闸机，价格只及大工厂产品价格的一半左右。

沁县最大的困难是政府和农业社都缺钱，要生产化学肥料，生产各种小型机械和新农具，开办各种小型企业，如发电、磨粉等站，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经费。钱从何来？沁县以合营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合营的形式有三种：因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谈一种，其余二种请看今年 1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我要谈的就是工厂和农业社合营，用沁县开村一带的泥炭，生产颗粒肥料，一斤能顶一担农家肥料。如全部投资由政府负担，不仅款无从出，且成本亦太高，农民买不起。工厂与农业社合营，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办法是工厂提供设备，农业社提供劳力，生产出来的肥料由各社直接分配使用，推销问题也连带解决了。颗粒肥料原来一斤的价格是 7 分 4，现在只有 3 分 9，有的社还可以根本不花钱，干脆用劳力换肥料。

沁县的工厂过去是个专业的蛋厂，冬天无蛋就无事，一年要停工五个月。现在这问题也解决了。冬天到来，蛋厂停了，大家就来挖硝土，熬硝，做卤水（肥料）；冬天榨油的业务较少，人力就可以转向印刷（年终有换账簿的活动，所以印刷厂忙）。工业生产所要求的连续性和农村市场的季节性之间原来有矛盾，现在因工厂与农业社合营而解决了。

现在我要在这里特别着重指出的，就是沁县把这个加工厂同时当做技术学校和技术顾问来使用，在这个工厂式的学校带动下，各社已经组织了 50 多个小组生产卤水。同时为农业社集中训练工人，若干天一期，外县也可以

来学。卤水是沁县人们心目中一种很好的追肥，浇了水再上了卤，就会使土壤松软透风，更好地吸收和保持水分。但工厂的活动不限于在工厂以内，他们也组织各地农业社生产卤水，对各社的生产予以技术指导。各社原来只能生产水而不能产块，也不能提炼火硝，经过工厂技术人员的指导，这两样技能也都学会了。工厂本县营企业必须“面向农村”的指示，还负责为农业社安装和修理各种农业机械和新农具，同时帮助农业社训练使用机械的人，有的订有包教包学的合同。这样工农业间的矛盾解决了，农业社买不起新机械的问题解决了，安装、使用和修理机械的困难也克服了。同时，农民的技术知识也普遍地传播开来了。我认为这个工农业合营的办法在一定的时期内，可能是广大农村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一种适当办法，值得各地仿效。

工业与农业脱节，不仅在山西如此，在其他各省，亦有同样的情形。过去襄阳专区许多农业社买了双轮双铧犁，都闲置着没有用，造成积压，并不是因为双轮双铧犁不好，而是因为技术工作没有跟上去，没有教会农民使用，没有根据地方的特点做适当的修理。当前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改变地方工业的管理体制，发挥县一级经营工作的积极性。比如河北省的地方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都设在县里，但都属省或专区一级领导，县里管不着，有劲使不上。因此现在各省应考虑把地方工业下放到县的问题，发展县营工业，由县里根据当地的需要，组织当地群众的力量，使地方工业更好地因地制宜地为农村经济服务。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10日

关于失业问题

与以上 2.2 万多职工性质相同的还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失业和无业人员，他们也有要求过高的倾向。他们向劳动机关要求只在本地不去外地，只愿做固定工作不愿做临时工作，只愿从事脑力劳动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只愿做轻活不愿做重活，只愿做干净活不愿做脏活，只愿做待遇高的工作不愿做待遇较低的工作。有的人百般挑剔，长期无法分配他的工作。北京市甚至有人被分配过 13 次之多仍不接受工作。显然这种情况是从多方面解决劳动失业问题的重大障碍。虽然公民应该享受劳动的权利，政府也有责任安置失业无业人员就业，但每个失业无业人员更有责任接受政府的分配，协助国家解决失业问题。要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分工的不同，各种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受到尊重，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是多方面的，有些人可以在本城本市就业，有些人需要到外地就业，有些需做工人，有些需做农民，有些人需从事文教卫生工作。只讲个人主义不讲集体主义，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品德不相符的。因此我们应该向群众讲清楚，凡被政府分配过工作而自己不愿接受的人，不能当失业人员看待，只能当做甘愿失业者，而甘愿失业者不是真正的失业者。这样失业问题不知要简化多少倍。此其一。

此外还有人说“叫技工做壮工活是浪费”，这要看实际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若是放着技工活不让技工做，反让他去做壮工活，这显然是浪费，应该批评；若是一时没有技工活只有壮工活，而技工闲着，暂时调技工去做壮工活，这是合理的，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呢？比如在基本建设工程方面，有时技工活多，如兴修铁道时遇到高山，要筑隧道，需要大批技工（开山工），遇到河流要架桥梁，需要大批技工（机械工）。但一旦隧道筑好了、桥梁架起了，铁路在平地上施工，土石方工程增多，又需要大批的壮工。在这个时候开山工、机械工又没有技工活可做，但工程上却很需要壮工的时候，调一些无活可做的技工去做壮工活，非但不是浪费，而且是完全合理的。若是让技工闲着，另外再去雇壮工，那倒是真正的浪费了。可是在技工方面有两种感想：（一）以技工做壮工活是“大材小用”，“有骨气”的人情愿不干。这完全是思想问题。我们在上面已说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劳动都是光荣的，无高低贵贱的区别，何来“大材小用”，凡是国家需要的都是大用，都受到尊重。北京市决定抽调三万干部到工厂、车间、商店、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去，将要较长期地参加生产和基层工作，使大家在劳动中受到锻炼。如果按照有些技工的说法，不是更要变成“大材小用”了吗？（二）技工的另一个感想是壮工工资比技工工资低，特别是技工刚调去做壮工活，操作不熟练，常常达不到定额，担心收入降低。这倒是值得领导上考虑的问题，总不要使技工收入降低而开小差。但这个问题是内部调整问题，似不必当就业问题来处理。此其二。

目前到劳动部门登记要求就业的，有一部分人实际上并不是失业人员，

其中一种人是根本没有就业条件的。据上海市去年 12 月的调查，身体残废和年老体弱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占 16.9%。对于没有劳动能力而又无生活来源的人，不是就业问题，而是救济问题，似应由当地民政部门进行救济。此其三。

此外到劳动部门登记要求就业的，有一部分是从事主要家务劳动的妇女，她们要带孩子、做饭，有的还喂猪、喂鸡鸭，生活的计划与粮食的进出都要经过她们的手，因此在节约粮食方面她们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她们节约得好，粮食就大可节约，应该动员她们勤俭持家、节约粮食，并教养好子女，把家务管好、生活过好，以使自己的亲人安心工作，不必自己另找工作。此其四。

现在有一些高中毕业生把升学当做唯一的出路。他们报考高等学校未被录取，即使愿就业也是挑剔得很厉害。他们表示愿意去工矿、企业、机关，不愿去农村。他们以为有物理、化学、三角、几何、生物等科学知识，如果派到农村去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他们不了解今天需人的地方是农村，而在工矿企业等没有进一步发展以前人员并不缺少。我们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要搞好农业合作社的管理工作，并逐步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农业技术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改良土壤、合理施肥、改良品种、改良生产工具、防治病虫害等，都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高中毕业生初步掌握了物理、化学、三角、几何、生物等基本知识，下乡后，一边实践一边继续学习，将来就可成为农业战线上的水稻专家、棉花专家或养猪专家，他们的前途是无限的。只要向他们讲清楚，他们有理智，一定能够服从分配。此其五。

其具有劳动条件又无职业，且是不甘愿失业的人，才能够算做真正的失业人员，对他们劳动部门应迅速予以介绍并给以适当照顾。此其六。

由此观之，由于失业人员登记不够切实，分析不够清楚，便造成了我国失业人员过多的假现象。真正的失业人员，决不致如一般人想象中那样多，故各地对失业登记人员做一次清理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经济落后，自 1958 年开始我们要建立 12 个大结合，目的在加速发展工业和农业，并扩大就业面。因此一面控制人口，一面加速发展工农业，就业问题的解决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况我国的失业问题不是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我国的社会人士可以借出资金，借出物资，或帮助修理，或给以技术帮助，尽量使失业的人从事某一项劳动，或利用晚上时间帮助失业人员组织生产合作社，这样就能帮助他们解决自己的生活出路问题。比如重庆市在 1957 年第一季度安置的 17600 人中，由国家介绍就业的不到千分之四，其余都是在各方面的热心人士帮助下获得出路的。

我们在这里把失业分为甘愿失业与不甘愿失业，好像与凯恩斯在他的就业理论中的分析相同。我在这里要郑重地声明一句，我的分析与凯恩斯的分析词同而性质不同，兹在下节说明之。

原载《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

政治立场》，财政出版社 1958 年版

为什么要强调人口的质量

数量和质量往往发生矛盾。有时人们过分强调了质量，忽略了数量。但质量一定要通过相当的数量才能表达出来。过去我们有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连一吨洋钢都没有；倘能把洋钢炼出来，一吨也好，十吨也好，就是莫大的成功，不能再斤斤计较质量，因为炼出来的钢本身一面代表了数量，一面也代表了质量。无论炼出来的钢是高碳钢，还是低碳钢，它们总是钢，而不是其它。因此过分强调质量是不对的。这就是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有时我们过分强调数量，忽略了质量。当我们已经炼出了 800 万吨洋钢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追求钢的质量，否则量与质太不相称。我们不但要炼出钢来，而且要炼出好钢来。有了数量，还不能令人满意，一定还要从数量中去求质量。而且不求质量，已有的数量是不可靠的，要打折扣的。几百几千台的机床制造出来之后，如不能转动自如，或不能起应有的作用，只得抛在一旁，作废物处理，不但给国家带来了一大笔损失，而且完不成数量计划的任务。这就是合乎“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的辩证法提法。现在我们所要求的是质和量要配得适当，要统一起来。

我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之两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原子能时代，非把人口的质和量快快适当地统一起来，很难完成原子能时代的任务。这就是我在本文中为什么强调人口质量的缘故。

南方有一位大学校长，人民大学有一位教师，某经济杂志有一位总编辑，以及北京大学经济系若干教师们认为我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思想体系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批评是他们不知如何看问题最明显的表现。让我慢慢说来。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呈现一种冷酷忧郁的色彩，他似乎说：工人的工资已不能再提高，因为即有机会提高，亦必为新增加的人口所压低，结果工资仍回到原来的水平。救贫税和工会活动亦不能有所帮助。贫民的痛苦，不是外来的，是他们自己所造成的。他们缺乏先见，多生子女，故要消灭他们的痛苦莫如他们自己。马尔萨斯就这样把贫苦的责任放在贫民自己的身上，把富人的责任推得净光。富人闻此可以高枕无忧矣。虽然他也建议采用预防人口增加的方法，他的人口学说却给劳动群众一个没有希望的悲惨远景。

李嘉图就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财富分配学说。他认为人口日益增加，粮食生产不得不向逐步贫瘠的土地推进；土地愈贫瘠，每单位的产量愈少。假定最好的地每单位生产 25 斗，次一等地生产 20 斗，再次一等的地生产 15 斗，最后一批地每单位生产 10 斗。粮食价格由最后的一批地决定。假定每斗 2 元，计收入 20 元，这 20 元的收入适足以偿付一切费用连同工资利息在内。所以最后一批地没有地租。在高一级的土地上每单位生产 15 斗，每斗 2 元共收入 30 元，除开支 20 元外，尚剩 10 元，这 10 元就是

地租。再高一级的土地，就收入 40 元，能出地租 20 元。最高一级，就是最好一级土地收入 50 元，能出地租 30 元。如人口继续增加，粮食又不够吃，再向低一级地推广。假定每单位只产 5 斗，每斗非卖 4 元不可了，计共收入 20 元，只足以偿付一切开支，工资利息在内，但没有地租。上次的无租地（即产粮食 10 斗的地）现在能出租 20 元了。最高的一块地现在收入 100 元，除开支外，尚剩 80 元的地租，比上次增加 50 元，因此人口愈多，食物生产愈从好地向坏地推广，地租愈增。因此李嘉图相信人口愈增，社会愈不得不仰仗于日益贫瘠的土地，以取得食物，而日益增加的一部分产物，就以地租的形态，归地主所有。所以在李嘉图的眼目中，地主阶级是反社会进化的，就是他们的利益是与社会的利益相反的。他研究的结果也是很悲观的。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尔萨斯在人口增殖超过食物增加这个自然性质的观点中，去寻找贫民痛苦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贫民痛苦的原因，不是如马尔萨斯所说的自然界的吝啬，乃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真正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不是自然性质的。因为贫民千辛万苦得来的成果，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所以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我国的某些大学经济系一部分教授和某些经济杂志的编辑、总编辑仍抱这种见解，仍以“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来对抗马尔萨斯的自然性质的理论。殊不知中国的情形已经大变了。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在中国已经失效，不能再用来对抗马尔萨斯了。我们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最先进的制度，其组织形式也是最完善的，不能再说我国的生产关系还没有搞好，还在那里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既然说人民公社好，不能再说生产关系还没有搞好，还在那里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几位大学教授和经济杂志的总编辑仍以这种过时的理论来对抗马尔萨斯，还说我拜马尔萨斯为老师，他们称马尔萨斯为我的先师。

现在中国的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可以说“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来一个民主主义革命，来一个政治革命。如现在继续宣传“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推论结果就是还要来一个政治革命。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定会危害国家的大事。现在的情形不是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于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社会性的旧理论虽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没有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仍然有用，但于中国已失其效力了。中国已跳出这个阶段而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的缺点不是生产关系没有搞好，乃是劳动生产率不高。救济的方法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决不是政治革命。因此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学说来对抗马尔萨斯。这个学说的目的在于把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把科学研究的成就日益提高和扩大，直到我们能制造人造食物来补充马尔萨斯食物的不足。这个新的学说不同于旧理论。“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的旧理论只适用于一时，一旦生产关系搞好了（如中国建立了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这个旧理论就不

适用了。我的新学说永远可用，而且时间愈久，科学上的发明愈多，适用的范围愈广，学说的说服力愈大；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亦不难把马尔萨斯的学说送到坟墓里去。但是这些大学校长、教授和总编辑说我的思想体系是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忍受，不是因为别有用心，乃是因为他们是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和科学院某经济杂志的总编辑，地位高，学问好，你对他们无可奈何。有一位人民大学的教授说我的学说总不对他的口径，就是不适他的口味，我百思不得其解，大概是由于他平日西餐吃得太多所致。中国人应该多吃中餐，吃惯了决不致不合他的口味。

现在我更进一步谈一谈不负责任的言论将闯出什么样的大乱子来。现在我们已进入了原子能时代，将来科学的日益昌明，不知要领导我们走得多么远。暂举一例来说明我的意思。在 1959 年 5 月 29 日苏联《真理报》上有一篇苏联科学家写的文章，讨论电子计算机的功能。他的意思就是如计算机的工作，比计算员的工作快二万倍，我们就可以用一部计算机来代替二万人的工作。这二万人的工资，每人每年以 1.25 万卢布算，每年须付 2.5 亿卢布；但一部计算机的生产费不过 200 万。在这里每年不知能够节省多少钱。但节省经费虽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却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说计算机工作的速度比计算员大二万倍，并不意味着这二万个计算员能把计算机的工作取而代之。计算机的功能就在于运算的连续性，即下一步计算的开始，一定要在上一步计算结束之后，不能使所有二万人同时动手。要解答一个问题，只能由一个计算员进行计算。这位科学家说现在常有需要用机器连续计算十小时左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时急待解决。如用计算员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非工作十年不可。无论计算员人数怎么多，二万甚至四万六万，亦不能缩短它的计算时间。但问题是这样用十年功夫算出来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呢？国防问题有时急需于几小时内解决，你用几年的功夫得出来的结果有什么用处呢？一国的元首，或国务总理或因要事明日即需飞欧洲或美洲，我们要的是很准确的天气预报。倘然这个预告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算得出来的话，那末这个预告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人就多至二万、四万、六万有什么能力能够替代计算机的工作呢？就中国今日进展的速度来推测，我想十年十五年之内，这些问题就要摆在桌上来讨论。那时，用一部计算机好呢？还是安插二万、四万、六万人好呢？安插了人，就抛弃了计算机，就是人多拖住了技术进展和科学前进的后腿。反之用了计算机，这许多人如何安插呢？这些教授总编辑拆了烂污，到那时可以不问不闻，但政治家不能不问不闻，弄得他退既不能，进亦不无困难。那个时候，恐怕你们还要在旁讥笑政治家的无能，其实罪魁祸首都是你。现在苏联专家们已在讨论自动化之后腾出来的人如何安排的问题，他们也觉得不是没有许多困难的（见《关于全面自动化》一文，载 1959 年第 9 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苏联国土面积是 2240.4 万平方公里，中国是 960 万平方公里，故苏联国土大于中国二三倍。苏联人口只 2.8 亿人，

中国人口恐怕不止 6.5 亿人，故中国人口大于苏联三倍多。如把两国人口放在同一水平上来讨论，则苏联应有 15 亿多的人口。现在它只有 2.08 亿人，只等于应有的七分之一以下，而科学家就在开始讨论如何安排因自动化而腾出来的过剩人口，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定要造成大量的失业，在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可以克服困难，但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何况你们还坚持人多是好事，人多可以办事，中国工人们就不赞成你们这种说法。1959 年《劳动》杂志第 15 期载有一篇以《人员步步减，采煤月月多》为题的文章，说人多并不是好办事，正如淮南矿务局工人大字报所批评的：“人多了造成五多，思想问题多，生活问题多，工作扯皮多，官僚主义多，窝工浪费多。”但在一穷二白的中国，资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组织起来，利用它作为一种资源，不是没有好处的，但不要忘记亦有人多的坏处。人多固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的新人口论主张保留它的好处，去掉它的坏处；保全这个大资源，但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因为提高人口的质量等于增加人口的数量。这样有人口增加的好处，没有人口增加的坏处；有保全资源的好处，没有增加负担的坏处；且与马列主义的理论——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亦不相抵触；不但互相抵触，而且相互印证，因为马克思与列宁亦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华罗庚先生介绍我看一篇讨论电子计算机的文章，载在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科学技术新成就》一书中，作者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胡世华先生。这篇文章说：“假如敌机是在 1.8 万公尺高空飞行，可能在它开始轰炸之前只有十分钟发出警报，因此，我们消灭敌人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假如敌人是用核武器或破坏力很大的氢武器来进行空袭的，那么我们会感觉到消灭敌人的时间更加紧迫了。我们希望能在敌机飞到它预定的轰炸目标上空之前就把它打下来，而且最好能在距离海岸线比较远的海上就把它打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办法就是把探测敌机的装置（如雷达）和计算机都装在导弹里面，使导弹能够自己探测敌人的位置，计算敌机的未来位置与自己应当如何纠正航行路线，并自动地纠正自己的航线。这样电子计算机在导弹里面就担任了‘驾驶员’的任务，就好像在导弹里装上一个思想活动很快、动作很敏捷又能忍受导弹里面那种极为恶劣的环境的‘驾驶员’。”由此推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此后战争能否取胜，决定于人的智识，不决定于人的数量。这是智识的斗争，不是人数的斗争。在 1.8 万公尺高空飞行的敌机，非地面上密集的高射炮火所能打得下来的。我们只能使用导弹，而导弹里面必须装上雷达和计算机。万一我们没有计算机，一旦敌人使用氢武器进行空袭，结果如何你能想象得到吗？牺牲的人不是 2 万、4 万、6 万，乃是 60 万、600 万甚至 6000 万，遗留下来的残废，毁灭的财产尚不计算在内。你们要人多，岂不更少了么？你们诅咒马尔萨斯主义者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因为他们主张以战争来消灭人口。你们呢？你们难道不以战争来消灭人口吗？这就足以证明你们的思想体系是与马尔萨斯主义者一模一样的。时代不同了，新时代

要有新理论来配合。

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谈话，除裁军问题外，大半涉及生产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和平竞赛。他的意思就是苏联具有必要的条件，来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在产品总产量方面，以及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这里的三个方面以最后一个为最重要，所谓生活水平就是指最后一个而言。苏美两国的人口相差不多，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容易接近或赶上或超过。但中国与英国相比，怎么样呢？在总量方面要超过英国并不是难事，问题是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中英两国的生活水平的高低是以此为标准，不以总产量为标准。我们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就要实行按需分配，至少把生活水平提高到与英国一样。但英国的人口到现在还不过中国的十分之一；因此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超过英国十倍方可。我们人民公社的组织是最先进的，所以生产关系已经搞得很好，问题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发展还赶不上生产关系。人民公社的建立，一定可以扩大劳动协作，创造出更为良好的条件促进生产力更快的发展。但是还有人主张把中国的人口提高到九亿、十亿，食物还是够吃的。讲到食物够吃不够吃，那是回到马尔萨斯的老路去了。我不讲食物够吃不够吃，我讲的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能不能保证全国人民早些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这个大门迟早要走进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早些呢，还是晚些呢？你们要人多，要人口增加至9亿、10亿，岂不拖住我们进共产主义社会大门的后腿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似应留在政治经济学中去讨论。

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政治课的十多位教师，一年半以前组织了一个人口理论研究会。其中主要负责人是教授两人（樊弘、陈岱孙），副教授一人（赵靖），讲师二人（韩佳辰、周家本），助理一人（诸葛殷同）。成立时我亦被邀到会，但我是他们所树立的对立面。可惜他们的“人口论”至今尚未出版，真令人望眼欲穿。我想所以不早日出版，大概是由于他们要把“人口论”安排在政治经济学里面去，因为政治经济学是责成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经济系协同编写。别国的政治经济学可以不谈人口问题，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非谈不可。人口与生产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不谈人口问题，这本书是残缺不全的，是先天不足的，不会令人满意的。因此我尤其希望这本书快快问世，使一个“于哲学一窍不通”如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学习学习。我可以对樊弘教授保证你们的政治经济学出版之后，我一定抽出相当的时间向你学习高深的哲学。

原载《新建设》1959年第11期

关于《新人口论》的说明

1955年《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完成后，即着手准备人口问题的发言稿，打算在1955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但在浙江小组会上讨论时，好多代表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都是出于善意（那时会上空气不适于提出这样的问题），故我自动地把发言稿收回。今年（1957年）时机成熟，遂把发言稿在人代大会上提了出来。全文登载于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后，接到各地人民来信40余封，几无一不赞成我的主张。我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学派完全不同，他们主张以瘟疫、疾病、战争等残酷的手段把人口削减，而中国的马尔萨斯者竟主张把中国人口削减至两亿左右，我则不但不主张削减而且要提高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只主张把还没有生出来的人口，用避孕的方法控制起来而已。

原载《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财政出版社1958年版

附带声明

一 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

据去年7月24日和11月29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200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如我国的革命，只破而不立，决不能有今天。你我都不欢迎那些如李达先生所说的“扣名词、扣概念，语义晦涩，内容空洞，带一些八股气”的文章（195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第7版）。更不欢迎如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所批评的那种作风。王任重同志在他的《读书、谈心、想问题》一文中（载今年4月9日的《人民日报》）说：“讲共产主义风格，还要敢于坚持真理，从实际出发，而不要‘随风倒’。学习先进，力争上游，永远都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同志并不是真正学习先进，而是按‘空气’办事。听到人家一点风声，他就赶紧照办，不问一问人家究竟是怎么做的，也不想一想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和自己的情况适合不适合。事后看来，这些同志闹了许多笑话。为什么‘随风倒’？这里面有个‘抢先’的思想在作怪。有的同志怕落后，不管条件如何，事事都想站到头里。也有的同志是图虚名，好出风头。这种‘抢先’的思想，和党所教导我们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共产党人要赤胆忠心地为工作，不要为虚名工作；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要按‘空气’办事。”

我们所最欢迎的，是如潘梓年先生所说的那种概括各种新变化的哲学或经济文章，因为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哲学研究》1958年第7期）。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二 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去年有200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取过来，并在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中做了些修改（共七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据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无法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

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万零400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原载《新建设》1959年第11期

重申我的请求

我在拙著《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中（载《新建设》1959年11月号）有一个附带声明，就是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我说“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如我国的革命，只破而不立，决不能有今天”云云。但11月30日和12月7日、14日《光明日报》和《新建设》12月号所发表的评论，仍属于“破”的性质，不过写的人换了一批新的，素年没有见过面的人，原来的一批“老手”不出面了。这倒是一件好事。人越多，意见越多，使我领教的机会更多，不难最后只要以一篇文章来答谢几百位先生的好意。这予我以极大的方便，几百位先生愿以困难留给自己，以方便让给了我，这真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才做得到。不过过去200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都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11月30日《光明日报》登了庄次彭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最近在11月30日和12月7日、14日的《光明日报》上和《新建设》12月号上所发表的五篇文章更帮助我把我的几个理论弄得益加完整和坚固。我要对这五篇文章的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过了新年我就要出京视察三四个后才回京，回京后再加以一番分析和研究，拟以一篇文章来答谢诸位先生的盛意，可惜以后在《光明日报》上登出来的好文章，我是看不见了。去年我花了五个月的工夫视察九个省份，南自海南岛北至长春，买不到一份《光明日报》。直到了广州，请我的秘书，托广东交际处向广东科学院借用自8月1日到9月底二个月的《光明日报》。因为我的文章是分四次登出的（登在去年7月24、29、30、31日的《光明日报》），所以我要借8、9二月的《光明日报》看看有没有人批评我的文章。结果大失所望，借来的报残缺不全，只得请《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编辑委员会把我的这篇文章在1959年第1期中转载一下，以资保存而便参考。因此在我视察的期间，既然看不到《光明日报》上所载的文章，恕不答复，迨回京后再行答谢。但我要一再重申我的请求，过去的200多篇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现在的五篇也是“破”的，我总希望诸位先生多费些时间，做些真正的研究工作，写出一篇“立”的文章出来。你既然说“马寅初对大跃进情形的解释是不科学的”，那么，读者们都希望你做出一个科学的解释来；你们说我要独树一帜以示异鸣高，这话怎么说得出口？正因为我不要独树一帜，所以请你们来共树；正因为我不要一家独鸣，所以请你们来大家共鸣。你们不来共鸣，也是一种示异鸣高。有些人更变本加厉地说我要独树一帜，以与马克思对抗，这真是

千古奇谈了。比如 11 月 30 日《光明日报》所载的庄次彭先生的文章末段所说，马寅初要独树一帜，以与马克思对抗，他把重点放在“我的”两字（因为我的文章是以《我的经济理论和哲学思想》为题），我用“我的”两字完全是一个责任问题，我立的学说当然是我的，我负责任，你立的学说，当然是你的，你负责任。你立得好，我不来平分秋色，你立得不好，我亦不来代你负责。如果不说“我的”“你的”，请问谁来代我们负责啊？党和政府决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时候，决不会怀疑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有与马克思对抗的企图。

江苏《群众》杂志第 16 期社论反对对敢想敢说的人泼冷水。在这里我要很“坦白”地对诸位先生说一说：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 50 多年了，天天洗，夜夜洗，一天洗两次，冬夏不分。因此对我泼冷水，是最受欢迎的。这虽然是锻炼身体的一个好方法，但直接间接影响我的头脑，因此我获得了一个冷静的头脑，很适宜于做科学研究工作。话不多谈了，我相信党，我也拥护党，所以我从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上引文两段作为对诸位先生的一种贡献。

1958 年 8 月 30 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得好。它说：

“学术批判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批判的过程中，应当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发表的机会。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不同的意见多一些，争辩的时间长一些，是好事。这便于把真理弄得更鲜明。辩论中要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一时还找不到充分事实和理由来驳倒对方的，就应该进一步去分析研究。如果不能说服，而企图压服，那只是学术上无能的表现。‘压服’在思想领域中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学术思想问题和一般思想问题又有不尽相同之处，它需要以丰富的事实为依据。某些学术问题，在一定的时期内，由于材料还不够充分，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就不能下结论。”云云。

1959 年第 10 期《红旗》有施东向先生以《为了追求真理》为题的一篇文章，它给盲目批判的人一个很好的指导。施先生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是我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所必须依靠的指南针，……但是有了这个指南针，并不能使我们在还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上不费吹灰之力而可达到正确的结论。因此，就是人们确实依靠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而向前摸索真理，也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要在任何科学问题上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就必须详尽地掌握有关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在越是复杂的问题上，就越是需要穷年累月的努力，才能有真正的成就。”

“对于学术问题的错误，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要分辨两种性质的错误。有一种人并没有花过收集材料、认真研究的功夫，只是从感想出发，随便说出些错误的意见。这种错误应该说并不是在科学研究中的错误，而是根本不进行科学研究的错误，这种错误除了证明人们不应当这样做以外，没有

任何意义。另一种人是认真做了研究工作，但是因为方法不对头，掌握材料不完备或其他原因而做出了不正确的、不全面的结论。这种错误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往往是在达到真理的过程中所难免要经过的过程。科学史证明，在科学问题上，提出正确的结论的人固然是有功劳的，而那些勇于在新的科学问题上进行试探，提出终于被修正甚至被推翻了的假说的人，也是有一定功劳的……参加学术讨论的人，都应当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我们的社会，是真理能够开花结果的社会。但是有人却会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多数人赞同而动摇。……如果是正确的意见，即使只有少数人，甚至一二人同意，也应当坚持。在学术讨论中，真理有时并不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的人就会随波逐流，没有主张”云云。

我很高兴地告诉施东向先生：自《新建设》11月号登出我的文章后，同意我的信已经不是少数了；有的虽表示同意，但不敢签名，只写“读者谨上”字样，这部分地表明了今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实情况。我只得唱“独脚戏”，我只得单身匹马出来应战。

在我的文章中没有把中国人口分为“高等人”和“低等人”，我只说把中国人口的质量提高，包括所有阶层在内，工农和知识分子都在内。不错，国内报上常用“高级知识分子”字样，但这并不是我开始用的，而且这几个字并不代表一个阶级。现代“高级知识分子”都入了工会，大家都是工会会员，只有职务上的区别，没有阶级上的区别。有的人如宗正把中国人口分为“高等人”“劣等人”，根本不反映今日的现实。至于英国的罗苏和赫胥黎，美国的柯克和爱伦·台耳怎么想、怎么说，那是英国美国的事，我们知道得太少；即有所知，亦不过书本上的知识，死记几句教条主义，亦不能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无论英美学者怎样说，无关于我们的事。他们尽管说资本家是“优秀遗传的人”，是“坚强有力的人”，属于“高等人”，劳动人民是“心理不健全”的劣等人，应实行节育；他们尽管把人类分成“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并宣传白种人是“优等民族”应该担负领导世界的任务，主张“劣等民族”应该限制繁殖，“改良人种”，这是他们的胡说八道，与我何干？我所主张的，中国人口，包括各阶层在内都要节制生育，都要提高知识水平。文盲固然要教他们读书，高级知识分子亦要努力研究，提高自己，于必要时要向苏联或其他兄弟国家学习，分阶级的说法对我是不能套用的。中国现在正在形成没有阶级的社会，地主与资本家已经不存在，抄写几句外国书本的教条主义是纸上谈兵，工人和农民听起来亦不会感兴趣。如果在工人和农民没有解放之前，在反动党统治时代，在反动党统治的南京或重庆，这些人能勇气百倍，不顾死活，把这些话讲出来写出来，那倒是富有意义的。工人和农民听了，不但会感兴趣，亦且会感激无既。或在共产党境遇很困难的时期，能够说出这些话来，那倒是能起作用的。现在工人和农民已经变为国家的主人翁了，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中国已站起来了，不再是半殖民地了，而共产党也已掌握政权，你还来说这些话，既不及时，亦不切实

际；不但不切实际，亦是无的放矢。这些人从外国书本上的教条主义中得出“马寅初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结论，这个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讲的是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不是世界人口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基本上已经消灭，我要为它服务亦无从服起。反过来，法国的学者们和政府如这些人一模一样，正在竭力鼓吹人口增殖，难道法国的学者们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吗？这些人既然要硬说我的控制人口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我何尝不可硬说他们的人口增殖论是为法国人服务呢？因此从书本知识来推论，是非常危险的，不免把一把火烧到自己的身上来。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外国的书本子上，乃在于中国人民的心理上，广大群众对人口问题到底怎么想，每一对年轻的夫妇是不是还要“儿孙满堂，五世其昌”呢！是不是还相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呢？抑或情愿少生几个来提高自己和子女的文化和物质生活呢！因此我们要做一番调查、分析和研究工作，不能徒凭感想来发言。

有的人还把我三四十年前的老文章拿出来作为我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证据。挖老根，那是挖不胜挖的，这笔账是算不清的，可以不必费心。不错，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做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所以对1939年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负责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阶级一样。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我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挑拨离间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总而言之，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的人口问题，要调查、分析和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自己的，不能专凭教条来破别人的。毛泽东主席说过：“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的理论。”因此我重申我的请求。

原载《新建设》1960年第1期

附录一：

《新人口论》新在什么地方？ ——为庆贺马寅初先生百岁生日而作

张纯元

科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新理论和旧观点之间，尽管存在着某种批判继承关系，但是一种新理论的产生，必然总是对旧观点的一种革命、补充、改进、修正直到根本的否定。事物就是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运动形式中向前发展的。哥白尼太阳中心说是对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否定；牛顿力学是对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以物体“本性”为依据的物理学的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是对牛顿的绝对论时空观的否定；量子力学是对经典力学的否定；托马斯·杨和麦克斯韦的光的波动学说是对牛顿的光的微粒学说的否定；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是对托马斯·杨和麦克斯韦的光的波动学说的否定。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重农主义学说是从重商主义学说的否定；无产阶级经济学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否定。只有用新的思想、观点、理论去否定（否定不只是抛弃，同时也有肯定）旧的思想、观点、理论，科学才能发展，人类的认识才能接近客观规律。

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就是在人口学领域，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产物。马寅初先生把自己的人口理论定名为《新人口论》是名副其实的。它新就新在以独到的见解向当时中外传统人口观点提出了挑战，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人口理论否定了旧的人口理论。这篇文章是马老在75岁高龄时写就发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过了25年，如今马老已百年大寿，但是文中阐述的思想，犹如针对当前，叫人读起来倍感亲切，就像昨天刚写就发表一样。

—

《新人口论》新就新在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人口问题的教条主义观点。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及其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性质、待点和存在形式，面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会出现人口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肯定的意见。只是恩格斯在1881年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原则性地提及一点，恩格斯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至于用什么办法使人口数量适应这个限度，恩格斯说：“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

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您笨。”这表明了恩格斯尊重实践的坚定性和进行科学论断的严肃性。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会出现人口问题，首先是苏联理论界明确起来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分就业。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口过剩，人口不断迅速增加，人民物质福利水平很高，患病率和死亡率很低，同时有劳动能力的人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的实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口问题，连人口超过一定限度的可能性都不存在，而且人口不断迅速增加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人口现象的根本特征。在 50 年代，这个从某一个国家特殊条件下概括出来的认识，竟成了适用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规律，对我国学术界影响极大。同时，又加上人们片面地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地胡乱搬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的观点，于是在我国学术界逐渐酿成了这样一些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会出现人口问题，失业、人口相对过剩在我国永远消失了，许多人主张人愈多愈好。“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愈多，就愈能提早实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决不惧怕人口的高速度增长，而是为人口的高速度增长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人口高速度增长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永远不会存在人口问题就成为金科玉律，谁讲社会主义有过剩人口问题，谁就犯了“天条”，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就要受到批判，从而使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人口问题，成了叫人望而生畏的“禁区”，无人敢于问津。

马寅初先生怀着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诚之心，不顾教条主义的束缚，把个人利害得失置于脑后，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尖锐地提出了我国存在着人口相对过剩问题。马老认为，“我国人口太多”，“增殖率太高”，“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其结果，“我国人口问题将愈来愈严重，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非计划生育不可”。这个结论不是凭空轻易得出来的，而是牢固地植根于我国人口的实际状况。1953 年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达到 601938035 人，出生率为 37‰，死亡率为 17‰，自然增长率为 20‰。1953 年到 1957 年期间的人口增长速度，马老估计恐怕比解放之初几年还要快些。他列举七条理由来说明快的原因：（1）由于经济条件改善，“结婚人数增加”，“生育的机会也就增加了”；（2）由于妇幼保健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婴儿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45—146 页。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1955 年第 1 版，第 594 页。

参看《经济研究》，1958 年第 11 期。

参看《新建设》，1956 年第 12 期。

参看本书《新人口论》，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此。

死亡率下降”了；(3)由于“对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顾”，“老年人死亡率减少了”；(4)由于“国内秩序空前安定”，“人民死于非命的减少”了；(5)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尼姑与和尚大半还俗结婚”，娼妓问题也彻底解决，生孩子的人也就增多了；(6)由于“五世其昌，儿孙满堂”等旧思想作怪，一有条件“就忙着替儿子娶媳妇”，早生贵子；(7)由于政府奖励一胎多婴的家庭，助长着人口的增长。后来，国家的人口统计表明，1954年净增人口1466万，自然增长率为24.8%；1955年净增人口1233万，自然增长率为20.3%；1956年净增人口1270万，自然增长率为20.5%；1957年净增人口1479万，自然增长率为23.2%。在这四年期间平均每年净增人口1362万，自然增长率为22.1%，确比195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出许多。历史事实证明，马寅初先生对当时我国人口状况及其增长速度的估计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在这个估量基础上提出的我国存在人口问题的新结论也是科学的，它之所以几经扑杀而仍挺立不倒，就是因为它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马寅初先生关于我国存在人口问题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马家”，而不是马尔萨斯主义的那个“马家”。

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理论本身是否正确对事物的发展关系极大。马寅初先生关于我国存在人口问题的理论当时没有被重视和采纳，反而遭到一场无辜的批判，而那种脱离实际的人口越多越好的教条主义观点却占了“上风”，成了指导实践的“香花”。在这种错误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口继续无限制地盲目发展着，从1957年到1976年这20年间，平均每年净增人口1670万（1959到1961年非正常减少人口除外），总共净增人口3亿多，自然增长率为23.6%。其中最高年份净增人口2270万，自然增长率为33.5%。人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繁殖的结果，正如马寅初先生预料的那样，“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拖了工业化的后腿”，而“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反之，如果我们在20多年以前就按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办事，实行控制人口的政策，那末我们现在的人口绝不可能达到接近10亿大关，而是七八亿或更少一些，各方面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紧张，日子就会好过一些，“四化”的步子也会更快。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它终于宣告马寅初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人口问题的理论是正确的，而那些“苏联没谈，我们也不能谈”的教条主义者关于人口愈多愈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

《新人口论》新就新在提供了中国人口问题性质和表现形式的新思想。所谓存在人口问题，一般是指人口过剩或不足而言。它在稍许过剩或不足情况下，是显现不出来的，只有当过剩或不足达到相当程度时，才为人们所注意。从人口学说的历史来看，人口过剩有两种提法：一是绝对人口过剩，即人口比生活资料绝对过剩，因而在一定时期会出现无法养活的人口，其原因据马尔萨斯说是因为人口增长总是快于生活资料增长所致；二是相对人口过剩。这种人口过剩又有两种类型：一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人口相对于资本需求显得过剩；二为在某些国家中出现的劳动人口相对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程度显得过剩。这后两种情况，尽管都是相对人口过剩，但是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在把资本主义的相对人口过剩和资本主义以前的人口过剩比较时指出：“现在（指资本主义时代而言——引者），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所以，前者即资本主义类型的人口相对过剩属于“生产力压迫人口”的性质，而后者则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的性质。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这种情况不能不对新中国的人口问题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人口近 5.5 亿，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466 亿元，粮食总产量只有 2200 亿斤，每人平均占有粮食只近 400 斤，城市失业人口 400 万，失业率高达 33%。实际上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早已相当严重。尽管解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人口也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增长着，情况没有根本改变。我们国家的特点仍然是：经济落后底子薄，人口众多增速高。面对现实，敢不敢揭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每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学识和胆量的考验。当时，就是在那些承认中国存在人口问题的人们之中，一般也只谈到人口多、底子薄，人口问题带来不少困难，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揭穿这个问题的实质。马寅初先生则不同，他能言人家想言而不敢言者，成为这派观点的代表人物。马寅初先生以他长期调查研究所形成的卓见为理论根据，多次以不同方式指出，我国人口问题是“人口多，资金少”，“人口增加得太快，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这实际上十分清楚地阐明了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是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类型的，这一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原理的。

马寅初先生不仅指出了我国存在的人口问题的性质，而且用以许多笔墨集中地分析了我国人口问题的表现形式。众所周知，人口的状况与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人口的发展变化既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受经济发展的决定，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它们之间关系的状况是人口问题表

现的主要形式。因此，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揭示就成为人口问题研究的核心所在。而两者的关系又是多方面的，因而对人口问题表现形式

的考察，也必须从多方面进行。马老就是从人口状况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这个本质问题出发，运用矛盾分析法，从多方面揭示了我国人口问题的表现形式；而人口问题表现形式又主要体现在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些矛盾上。这主要体现在：

1. 人口迅速增长与生产设备不足的矛盾。我们知道，人是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体而存在的。人作为生产者只有与生产设备相结合才能进行现实的生产。生产设备不足，或者降低劳动者的技术装备水平，都表明人口过多，同生产设备发生了矛盾，人口数量同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程度相比显得过剩了。因而马老认为，“要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要大力地积累资金，加强每个工人的技术装备，同时还要控制人口，因为如人口增殖任其自流，资金很难迅速积累”，技术装备水平也无法提高。

2. 人口迅速增长与工业原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要加速积累资金”，“最好发展轻工业”。要发展轻工业必须有足够的原料才行。“轻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农业”，“所以各种经济作物与粮食互争土地，二者之间一定要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我国人多，又“无限增殖，这一适当平衡将更被破坏，因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工业”的发展，这种情况表明了我国人口问题的存在。因而马老明确指出，“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3. 人口发展快与资金积累慢的矛盾。马老说：“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一定要增加国民收入。”我国的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水平来说是很低的，在世界上 152 个国家和地区中是倒数第 21 位。这个较低水平的国民收入在分配时，“因人口大，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产部门之中，觉得更小了”。这种情况，集中表明了我国人口众多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和压迫。我们要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一面加速资金积累，一面大力控制人口，否则“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

4. 人口发展与就业之间的矛盾。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增长又快，在现有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必然产生就业的困难。这是我国存在人口问题的不可避免的事实。马老指出，现时的“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但每年还要增殖出来 1300 万人，除在工业部门安置 100 万人外，要把其余 1200 万人口安置在农村”，但是我国本来就地少人多，“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 1953 年的二亩八分降至 1955 年的二亩七分”，“长此以往，如何得了”。同时，马老还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站得高，看得远，尖锐地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 1000 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50 个人

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 950 人怎么办？”因此，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也“必须控制人口”。

5. 人口发展与教育事业落后之间的矛盾。人口的发展，要求文化教育事业与其相应的发展。但是，文教事业的发展主要不取决于对它的需要，而决定于经济实力给它提供的可能性。我国人口多，经济落后，每年可能提供的实际教育经费是很有限的，因而必然出现人口发展与教育事业落后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大中小学均不能满足需要，普遍感到师资紧张、校舍紧张、教学设备紧张，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不能得到应有的提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人口众多对生产力的压力。而一个国家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国家对教育的投资状况，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起着重大作用。因此，为了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6. 人口发展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之间的矛盾。旧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十分落后的。尽管解放后政府非常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也花了很大的力量，但是现状仍然是很落后的。而生产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马老指出，生产力“乃是深刻的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俟科学发展之后又回过头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了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必须把科学技术搞上去。那么，如何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呢？“欲达到这个目的，唯有加速积累资金……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因此，“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7. 人口发展与粮食增产之间的矛盾。粮食是人们必须的生活资料之一。民以食为天。我国人口众多，增殖又快，必然要求粮食的生产也要迅速增长。而粮食生产来源于农业，我国农业的特点是人口多土地少，虽然有许多荒地和草原，但是由于生态平衡和其他种种原因，不能大规模开垦。“因此主要的增产途径是充分利用现有耕地，提高单产，但由于人口众多，每人占有耕地面积又在减少，这些都是人口增长与发展粮食生产的矛盾所在”。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根本不存在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绝对过剩即粮食缺乏到无以维持劳动者生命的地步。但是，由于人口多，增长快，粮食生产是严重的短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全国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大体徘徊在 600 斤左右，有的地方仅有 400 多斤，比全世界每人平均水平约少 200 斤。每个农民每年提供的商品粮只有 90 斤左右，商品率十分低下。而粮食这种特殊商品，又是保证生产建设和物价稳定的最重要物资，粮食短缺，粮价不稳，整个市场价格就不可能稳定，国家建设也无法进行。因此，人口发展与粮食增长之间的矛盾给予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以极大的压力。为了减轻这种压力，进而变压力为动力，必须一方面有计划地发展粮食生产，另一方面积极地控制人口增长。

8. 人口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就是“最贫穷的农民亦不致卖男卖女，挨饿受冻，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了，但是由于人口增加过快，生活“改善受到很大限制”。

“现在粮食紧张，猪肉紧张，布票对折使用，煤也不够烧，这一切都牵连着人口众多的问题”。30年来，虽然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但按人口平均消费水平却提高很慢，有的根本没有提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人口增长太快。新增产的粮食基本被新增加的人口吃掉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数额相当大的部分也被新增人口消费掉了。所以为了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非控制人口不可”。

三

《新人口论》新就新在指明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向，提出了控制人口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由于人口问题性质不同，解决的办法和途径也不同。资本主义的相对过剩人口，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又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因此它自身无力解决，而必须借助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方能得到彻底解决。我国的相对过剩人口，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自然开发比较缓慢，生产发展相对不足造成的。因而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人口问题的解决，“就业问题的解决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此，我们充满信心，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马老在《新人口论》中，全面论述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向和根本的途径，这就是：（1）积极发展生产；（2）控制人口数量；（3）提高人口质量。

马老认为，“人口与生产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因为只有生产发展了，人口与经济的许多矛盾才能缓解和消除。而要发展生产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鉴于“我国的情况是劳力多，资金少；资金少，投资就少”，因此“大型工业不要多，可以因地制宜，多搞一些中小型工业，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个办法”。同时，马老从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关系出发，建议要把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这两件事必须同时进行，否则要给计划经济带来很多困难。”这个建议是深刻的，具有远见卓识的。

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在积极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必须大力控制人口数量。“只要把人口控制起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崇高的愿望不难成为现实”。怎样控制人口数量呢？马老认为：

1. 实行定期的人口普查，建立人口动态统计，以便为制定正确的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提供准确的数据，“否则人口统计不正确，所定的计划一定会被打乱，结果计划一定会落空，久而久之，就会出问题。”

2. 实行计划生育。马老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计划生育主要就是计划好人口出生率，把它与国民经济各方面协调起

来，事情就好办了，这是控制人口增长的关键所在。

3. 加强控制人口重要性的宣传工作。计划生育是既涉及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又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要使广大群众自觉自愿实行计划生育，必须加强宣传工作，使它成为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还要批判宗法的男性继承观念，清除“儿孙满堂”、“五世其昌”等封建思想，使广大群众从旧思想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都明知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只有如此，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4. 提倡晚婚晚育。马老认为，从各个方面来看，“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这样的婚龄虽然比我国现行法定婚龄为高，但与其他某些国家实际婚龄相比并不算高。例如，希腊妇女实际平均婚龄为25岁，比法定婚龄高13岁；瑞典妇女实际平均婚龄为26岁，比法定婚龄高8岁；法国妇女实际平均婚龄为23岁，比法定婚龄高8岁；苏联妇女实际平均婚龄为26岁，比法定婚龄高8岁；日本妇女实际平均婚龄为24岁，比法定婚龄高8岁。所以我们也必须逐步破除早婚早育的陋习。

5. 运用经济手段推行计划生育。马老从当时我国人口的状况出发，主张生两个孩子的有奖，三个孩子的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就以征来的税款作奖金，国家在预算上既不支出也不收入。

6. 运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马老指出：“我们的社会是集体的社会，集体的社会要有集体的生活，因此不能够认为结婚生孩子，仅仅是私人的事情，它牵涉到我们的集体利益。”“照目前的计算，国家在每个孩子的教育及就业装备上要支出一万元以上。一般人往往不够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所以为了更好地控制人口，“自然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

7. 运用避孕的办法，达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的。马老认为，“最主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是对的；反对人工流产，未免过于陈旧。但是马老是从维护妇女的利益和有利于我们的整体事业出发的，他的主张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近十年来，我们所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许多具体做法，充分证明了马老50年代的这些主张是科学的，有预见性的，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主张最后变成全党全民的共同认识，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曲折过程，耽误了宝贵的时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人口问题不单纯是个量的问题，也有质的问题。所谓人口质量，实际上说的就是人体本身具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人们常说的人口质量高低，实际上指的就是人本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条件的好坏和能力的大小。我国人口数量虽多，但质量不是很高。“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之两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据此，马老明确指出来要全面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必须“提高知识水平”、“提高人口质量”。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控制住人口数量的增长，也才能有力地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

原子能时代”。这个时代的斗争“是智识的斗争，不是人数的斗争”。没有高质量的人，就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就没有高速度发展的生产力，当然也不会有个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祖国的富强。50年代如此，当今也仍然如此。我们今天进行“四化”建设，就是要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必须提高人口质量。四个现代化只能在人口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也就没有四个现代化。因此，我们必须决心下大力气抓好人口质量的提高工作，这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方针。

四

《新人口论》新就新在不但与马尔萨斯主义和一切旧人口理论划清了界限，而且对他们的理论做了相当中肯的批判。众所周知，在解放前，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受到马尔萨斯主义的严重影响，在某些著作中也宣扬过马尔萨斯的人口观点，对于这个问题马老是从不忌讳的。可是，50年代末期，批判《新人口论》时，竟不顾《新人口论》与马老以前人口理论的根本区别，不顾《新人口论》对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而仍用解放前的某些观点，证明《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的翻版，硬把二者捆在一起来批，挖老根，算旧账，这种做法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此，马老曾经明确申明，他说：“挖老根，那是挖不胜挖的，这笔账是算不清的，可以不必费心。不错，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做过文章批判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所以对1939年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负责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阶级一样。”

鉴于人们对人口问题的敏感性和斗争的复杂性，马老有先见之明，不仅用自己全部的人口理论在思想体系上同马尔萨斯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在《新人口论》中专门用了很大篇幅对马尔萨斯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首先，在人口理论立论的依据上，马老批判了马尔萨斯臆造出来的“两个级数”的谬论。我们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心是，“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马尔萨斯正是以此为依据来建立他的“人口论”的，他认为人口的增长总是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因而劳动人民的贫困，不是政府之过，不是社会原因，而是由于人口繁殖总是快于生活资料增长造成的，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马老指出，马尔萨斯的“这种论调是他人口论的出发点，也就在这一点上他根本错误了”。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只是一种假设，具有抽象的可能性，并不是一个客观规

律。如果人口的确是按几何级数增加，那末不用追溯更远，就是从 1798 年《人口原理》出版时算起，现在的世界人口也应是 550 亿，而不是只有 45 亿。当然，最近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世界人口有加快发展的趋势。1650 年世界人口只有 5 亿，1750 年为 6.9 亿，100 年只增加了 39%；在 1850 年增为 11.2 亿，100 年增加了 60%；1930 年为 20 亿，80 年增加了 80%；1976 年人口达 40 亿，仅 46 年就翻了一番。另外，从国别分组统计来看，在 160 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口 30 年以内翻一番的国家和地区就占 60%，100 年以上翻一番的只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300 年以上翻一番的只是个别的。也正是从人口增长的这种情况出发，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执行着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但是，人口加快发展的这种趋势也没有出现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事实。所以马老说：“他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理论也就此破产了。”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的说法更是不能成立的。马老指出，马尔萨斯“没有想到以后的科学研究能够飞跃地发展”，而科学的发展，“一方面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减低”。马老在例举了德国的事实以后说：“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要快，他（指马尔萨斯——引者注）的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的理论基础就此破产”。由于“两个级数”本身是虚构的，运用“两个级数”的对立而引申出来的结论——人口增长总是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也就不攻自破了。人类社会长期实践证明，生活资料的增加速度往往超过人口的增加速度，否则人类社会就不会有今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将更加提高，物质财富将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当然，这并不排除在个别时期、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可能。例如，印度在过去的 20 年中，人口以平均每年 2.43% 的速度增长，而粮食只以 2.27% 的速度增长，人口增长超过了粮食的增长。这是复杂机体运动的正常现象，不足为奇，因为在形成客观发展趋势的必然性当中总会存在个别的偶然性。但是，从长期历史过程的总体来看，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快于人口的增长。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贫民痛苦的原因，不是如马尔萨斯所说的自然界的吝啬，乃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真正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不是自然性质的。”

其次，在控制人口的办法上，马老批判了马尔萨斯消除“过剩人口”手段的反动性。马尔萨斯为了解决所谓人口增长总是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矛盾，提出了削减人口的两种办法，即“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对此，马老在主要观点上都做了对比批判。他指出马尔萨斯“主张以瘟疫、疾病、战争等残酷手段把人口削减”下来，其本质是仇视劳动人民的，也是极其反动的；他的“道德抑制”就是叫劳动人民独身、晚婚和不育，而富人则大可不必，这是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的，也是最不道德的。马尔萨斯站在牧师的立场上，极力反对运用科学避孕方法来控制人口，更是落后和无知的。

最后，在理论的目的性上，马老揭露和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的辩护性。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在 1798 年出版之后，受到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热烈

喝彩，其原因就在于这本书“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府，掩盖英国政府的错误措施”，欺骗劳苦群众，转移视线，妄图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使资本主义制度长治久安。因此，就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思想体系来说，是反对社会进步、反对生产力发展、反对劳动群众的，这就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实质所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 31 年的实践证明，《新人口论》阐明的人口理论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是科学的。在 20 多年的风雨中，马老的人口理论虽然几经沉浮，但理论威力始终不减。真理在反复实践中才能被人们普遍认识，真理经过时间的考验才更放光辉。今天，这个在人口学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新人口论》，正重新被肯定，我们确信它必将在繁荣中华民族、实现“四化”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 3 期

附录二： 经济学界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

孙冶方

最近读了龚明同志在7月1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如果没有民主，什么事情也办不好——应该为马寅初先生恢复名誉》的文章。文章写得很好。回想当年对马寅初同志关于人口问题等正确主张的批判，无论是1958年以前或1959年底以后，两次高潮，都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特别是后一次，在那个理论“权威”——后来成为“四人帮”的顾问——的策动下，更加变本加厉，从1959年底到1960年1月，除了在马老担任校长的北京大学以各种形式进行批判外，还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批判文章，给马老扣了许多政治帽子，如“用学者幌子搞猖狂进攻”，“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一贯为帝、封、资服务”，“攻击‘三面红旗’”等等。马老被迫于1960年1月辞去曾担任九年的北大校长职务。尽管他对报刊上的批判始终不服，但却被剥夺了正常的为自己的观点申辩的权利，从此在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销声匿迹。一个大大有利于中国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关于节制生育、降低我国人口增长速度的好建议，就这样被蛮横地打入了冷宫。

龚明同志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双重反响。一是觉得有责任向马老致歉意。这是因为，1958年起围攻马老时，我正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的职务。由于奉行唯上主义，对于布置批判马老没有好好地问一个为什么，也没有认真看马老的文章和意见，而是等因奉此，照转照搬。虽然我没有直接写批判文章，但却在我们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杂志上前后发表了十篇文章，对他进行全面的围攻、批判。这是一种压制民主，迫害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做法。对此，我是要负行政责任的。实践证明，马老50年代关于人口要控制和经济要综合平衡的意见是正确的，是很有远见的。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如果当年就采纳他的人口主张，采取措施，何至于20年后的今天人口会增加到9亿多，而且造成安排就业如此之困难！”现在已经到了为马老彻底恢复名誉的时候了，当年为此而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词，统统应予推倒。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动因。

龚明同志的文章，还促使我提前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口问题。本来，在我计划写作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第六章，在论述劳动问题时，就要专门研究和论述人口问题和就业问题。我现在刚刚开始写第一章导言。龚明同志的文章发表后，为了了解和研究马老的人口理论，我就把对人口问题的研究提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逼出来的。趁这个机会，把我先考虑到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发表，也可以更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便将来做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

一 社会主义制度下节制生育同马尔萨斯主义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马尔萨斯主义人口理论是有根本区别的。听说去年在全国人口问题讨论会上，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我们也谈节制生育，就应该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批判继承。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对什么是马尔萨斯主义没有真正搞清楚，以为马尔萨斯主义者主张节育，因此只要提倡计划生育，就必须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重新估价”。为此，有必要简略地讲一下什么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核心是用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来掩盖资本主义的相对人口过剩，为对外实行殖民主义侵略，对内实行剥削制造舆论。马尔萨斯说，人口在无所妨碍时是按几何级数（即 1、2、4、8、16、32）增加，而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即 1、2、3、4、5、6）增加的，这样，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而且其差距将越来越大，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马尔萨斯还提出，人口增长因为受到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而与生活资料增长相平衡。所谓积极抑制是在人口开始增加后予以的抑制，如失业、贫穷、饥饿、瘟疫、战争等都是积极的抑制，这些因素可以消灭大量人口，从而实现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平衡。所谓道德抑制，就是认为那些没有能力赡养子女的劳动人民，不应当结婚。1798 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出笼，立即博得英国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喝彩。原来，在此之前，有两本抨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书相继问世。一本是英国威廉·葛德文写的《关于政治之正义的研究》，坚决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一个实行产品公有和公正分配的、平等的社会；另一本是法国马理·让·孔多塞写的《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观察概论》，认为人民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并认为由于科学的进步，人口的增长不会造成生活资料的不足。这两本书在英国以至整个欧洲影响很大。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就是为了同这两本书相对抗、企图抵消其影响抛出来的。

关于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出笼的历史背景及其反动实质，马克思写道：“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 18 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彩。”

马尔萨斯既然认为人口增长总是要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从而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失业、贫穷、饥饿、瘟疫和战争，这是一条同社会制度无关的“人口自然规律”，那么任何关于社会改革的学说就都无济于事了。很明显，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一种为资产阶级制度辩护的、反动的理论。至于继马尔萨斯

以后的所谓新马尔萨斯主义，除了主张通过科学节育来控制人口的增长外，其基本理论与马尔萨斯的主张毫无二致。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口问题的看法从来都是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穷、饥饿、瘟疫、战争，其根源在于私有制。至于耕地的收获，并不是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而是随着科学的进步可以大幅度地增长的。因而根本不存在什么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所谓“自然规律”。

恩格斯早在 1844 年，就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自然规律”的理论基础“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无视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点，做了有力的批判，强调指出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我们可以假定耕地面积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个面积上使用的劳动力却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即使假定收获量并不是永远和花费的劳动量同比例增加；但是我们还有第三个要素，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要素——科学，它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和人口的增长一样快。仅仅一门化学，甚至仅仅亨弗利·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二人，就使本世纪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但是，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和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列宁批评布尔加柯夫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辩护时指出：“技术进步是‘暂时的’趋势，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即在技术不变的基础上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递次降低（并非永远如此）的规律，却‘具有普遍意义’！这就如同说，火车停在车站上是蒸汽运输业的普遍规律，而火车在两站之间行驶却是使静止的普遍规律不发生作用的暂时趋势。”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深刻地批判了抽掉科学技术进步这个重要因素的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落后于工业的种种原因，其中指出，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力学，在 18 世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臻于完善；而那些与工业相比更直接地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的科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只是在 19 世纪，特别是 19 世纪的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马克思曾经预言，随着农业部门资金有机构成的提高，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和在实践中广泛的应用，“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相对地增长得快。”事实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速度超过工业。那里农业部门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有的甚至超过工业。美国 1975 年农业工人固定资产装备比制造业工人高近一倍，与此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21 页。

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判家》，《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89—90 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116 页。

相适应，战后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 6%左右，而制造业则不到 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事实证明马尔萨斯所杜撰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理论是错误的。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生活资料增长并不是赶不上人口增长，否则人类社会岂不是得不到发展了吗？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书发表近 200 年来，人口并没有按他估计的那样增长那么快，生活资料的增长更不像他估计的那样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相反，正是在这 100 多年间，在全世界范围内，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例如，根据有关资料，从 1878 年到 1957 年，法国人口增长 19%，而同期小麦产量则增长了 54%。美国从 1910 年到 1951 年，农业生产指数也高于人口增长指数。从全世界来看，从 1950~1976 年，世界人口增加了 64.6%，而同期粮食产量却增长了 77.6%。如果按全部生活资料生产总值计算，那么它的增长速度则大大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马尔萨斯任意选择以至伪造一些统计资料，杜撰所谓“人口自然规律”，并宣称它是一个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绝对“规律”，其实质是把战争、瘟疫、饥荒等本来是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问题，都归结为人口问题，从而达到转移视线目的。它的阶级性和反动性是十分明显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尔萨斯所杜撰的抽象的人口规律是不存在的。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为该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人口规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地、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在马尔萨斯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不变资本的增长快于可变资本的增长，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大规模地创造着产业后备军，形成相对的人口过剩。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所以，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伴侣。但是，这决不是像马尔萨斯所说的是什么绝对的人口过剩，而是相对人口过剩；也决不是像马尔萨斯所说的这种人口过剩是什么自然的规律，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由这种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的人口过剩。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从总量来说，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但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着生活资料的分配是极不合理的。在那里，一小撮不劳而获的资本家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糟蹋着大量的社会财富；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则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状况很难得到改善。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75 年美国占家庭总数 20% 的最穷家庭只占全部家庭收入总额的 5.4%，而另一部分占 20% 的最富家庭则占全部家庭收入总额的 41.1%。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口有其特殊的规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可以做到劳动人口充分就业，消除失业；可以做到

人口有计划的增长或者控制人口的增长；可以逐渐使每一个人获得全面的发展，不再让沉重的劳动总是只由社会一部分人负担；可以有计划地做到逐步提高人的健康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降低儿童死亡率，延长人的寿命等等。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社会主义能够保证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我国为例，1949年我国人口为54877万人，农业总产值为325.9亿元，粮食产量为2162亿斤。1978年，我国人口为97523万人，比1949年增长了77.9%；农业总产值为11459亿元，增长347%；粮食产量为6095亿斤，增长182%。

应该指出，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国人口的增长长时期内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做到有计划的控制；同时，生产的发展受到很大的破坏，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的，相反的，是违背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不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结果。我们相信，随着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随着我们自觉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必定能使人们更显著地看到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同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区别。

很明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计划地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节制生育，同马尔萨斯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

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节制生育的重大意义

批判马尔萨斯主义不能否定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增长。据统计，今天世界上一共有43亿人，正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到公元2000年时，增长率将下降到15‰左右，届时世界上将有62亿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就没有这样高速地、持续地增长过。人类花了好几十万年的时间，战胜了不知多少困难，千辛万苦，到1830年增加到10亿人。可是随着划时代的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只用了100年，即到1930年就增加了第二个10亿人；增加第三个10亿人，从1930年到1960年，只用了30年；增加第四个10亿人，从1960年到1976年，只用了16年。预计今后第五个、第六个10亿人所用的时间将愈来愈短。目前世界各国都已注意到了人口高速增长的增长会给社会带来种种不利影响，因而有些人口增长速度快的国家，已由政府和民间采取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制度，那就更加要对人口增长有所计划才是。我们很难设想，物质资料生产的有计划增长能建立在人口的无计划增长的基础上。恩格斯曾经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有必要也有可能做到有计划地调节人类自身的生产。他写道：“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点。”“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

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

列宁也明确说过，我们要批判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拥护传播有关避孕方法的医学著作等等”。可见，把提倡计划生育说成是马尔萨斯主义，是很大的误解。

人口有计划地增长，可以采取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也可以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这得看具体条件而定。我国当前的人口特点是：基数大，出生率高，死亡率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快。

根据这个特点，当前我国应当采取控制人口增长，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政策。最近，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把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大力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当前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十分正确的。我们一定要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来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

我国当前必须控制人口增长的第一个原因是用来装备劳动者的资金有限。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工业化时代，即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国民经济各部门资金有机构成的提高，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说过：“社会劳动生产力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特殊发展，在程度上是不同的，有的高，有的低，这和一定量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成正比，或者说，和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成正比，也就是说，和推动一定量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成反比。”一般说来，在用机器操作代替手工操作的过程中，新一代的劳动力必须有较上一代更多的资金装备，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的进步。马老在《新人口论》一文中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长得太快，而资金积累似乎太慢。”“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哉？”又说：“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我国过多的人口，就拖住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这些话说得很对。解放后不久，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这样切中时弊、远见卓识的建议，着实令人钦佩。

过去批判马老人口理论的主要炮弹是“人手论”和“人愈多愈好论”，即认为不能光看到人有一张口，而应同时看到人还有两只手，人所能创造出来的财富肯定比他所需要消耗的生活资料多。因此，人口再多一点也不要紧，不但会有饭吃，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本钱。这实际上是一种把人口问题简单化、似是而非的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完全忽略了人在生产中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所谓物质条件，一是生活资料，二是技术装备。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1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5—146页。

列宁：《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83页。

社会能吸收多少新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决定于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保证和是否有足够的技术装备两个因素。现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每个工人的技术装备是一万元多一点。如果要把每年新增劳动力一千二三百万个都安排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里而又不降低劳动生产率，就需一千二三百亿元以上的固定资产装备他们。而这在现在是根本做不到的。进入 70 年代，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每年新增固定资产约 200 亿元，也就是说，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每年还吸收不到 200 万个劳动力就业。

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尚不能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这些土地和资源，如在更高的科学技术水平下，是可以向更多的人口提供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不过我国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上面批判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同时，也要承认，在科学技术水平既定的条件下，在原有耕地上追加资金和劳动，到了一定的限度，那么由此而收获的农产品数量是递减的。这就是我国江南一带如苏州专区农产品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过去种两季，现在种三季；过去亩产几百斤，现在亩产上千斤，1500 斤，甚至 2000 斤，而技术没有大的突破。这样，每斤粮食的成本，就从四五分钱提高到一角钱甚至超过粮价。如果不控制人口的增长率，随着对粮食的要求越来越多，农产品的成本可能越来越高，农产品的价值可能取决于愈益劣等土地或更低投资效率下的生产费用。也就是说，我们将要投入更多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才能取得必要的为维持众多人口需要的农产品。可见，现阶段的人口增长速度已和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资金积累和技术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继续保持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话，其结果必然是等待就业的队伍愈来愈长，城市人口倒流到农村去，劳动者的技术装备程度降低，最后造成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在逐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时，都有一个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我国也不例外。毛泽东同志早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说过：“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但是，我国近 20 年来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变城市人口为农业人口的过程。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共产风”、瞎指挥以及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对国民经济，其中包括对城市工交事业的破坏；另一方面就是由于解放初期对人口增长不加控制，城市非但不能给予本身自然增长的劳动人口以职业，反而需要农村来给这部分人解决就业问题。如何安排城市就业问题，特别是如何安排每年到达劳动年龄的青年就业，已成为一个艰巨的、经常性的任务。现在这个问题十分尖锐。据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公布数字，目前全国城市中待就业人数已达 2000 万人。解放初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2.2~2.5%，到 70 年代每年就有 $6 \text{ 亿} \times 2.2\%$

=1320 万到达劳动年龄的青年需要安排就业，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由于人口基数不断加大，如果人口增长率不下降，我国以后每年到达劳动年龄的待就业青年将要比现在还会多得多。从长远来说，如不改变这种变城市人口为农村人口的倒流过程为“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那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基本问题就仍然没有解决。

要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不下降，人口不再从城市倒流到农村去，不外乎两个办法：

第一，大力贯彻中央与地方并举，大、中、小并举和土洋并举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尽量多安排就业。

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们需要一批新建的，拥有最现代化技术设备的企业，作为我们现代化工业中的标兵。在这些企业里，资金有机构成必然很高，从而每一个劳动力所需资金装备必然会增多，这样，在有限的资金情况下，能在这样的企业安排的劳动力或就业人数必然不多。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举办大批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但是可以安排较多的就业人数。

第二，实行计划生育，大力控制人口，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以至停止增长。这样安排每年到达劳动年龄的青年就业的任务过若干年后就能逐年减轻。正如马老 20 年前所说的那样：“在目前 6.4 万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 1300 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把每年增殖出来的 1300 万人口放在农村，虽然出于不得已，但难免发生副作用……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实践证明，马老 20 年前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是有根据的，是适合我国经济实际的，可惜我们当初非但没有接纳他的建议，反而对他进行批判，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我国当前必须控制人口增长的第二个原因是保护妇孺。

高生育率对妇女来说，生理上是很大的负担，危害很大；同时使妇女不能摆脱繁重的家务劳累。家务劳动社会化绝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做到。即使相当一部分家务劳动已经社会化了，也不可能完全免除妇女的家务操劳，更不能免除妇女生儿育女的生理负担。实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使出生率逐步下降，就可以减轻妇女的生育负担和家务拖累，使他们有机会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从而有利于妇女获得彻底的解放。

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来说，也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在相当长时间内，家庭仍然是个消费单位。一个家庭子女过多，不仅会使培育子女的生活费用加重，而且还会产生照顾不周，教育不当，使子女得不到良好的生活条件和适当教育。长期如此，整个民族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周恩来总理在 1956 年党的八大会议上明确指出，要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目的是“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

三 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

最后，我还要谈谈学风问题。马老解放后在 1955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人口问题，认为我国的人口繁殖不能再这样“无组织”、“无纪律”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他主张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而且还要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生育。作为一个人民代表，在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即使在内容上是错误的也可以用讨论的方式解决，何况这个提案不仅主观愿望是好的，而且所说的道理也是充分的。当时马老的主张还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表扬。可是，后来不但没有认真地接受他的意见，反而对他进行批判、围攻，这对“放”的政策是一讽刺，政治影响很不好。

在批判马老中，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唯上主义，不是唯实主义。当时的批判文章并没有认真研究，分析他的人口理论的精神实质和对现实经济生活的意义，而是根据上级意图，一拥而上，采取粗暴的、强词夺理的手段，断章取义地抽出他的人口理论的个别论点加以分析，再加上自己的主观推断，硬说他的观点实质上和马尔萨斯的观点一样。其实，马老解放后一再声明自己谈人口问题与马尔萨斯有区别，认为粮食的增长并不是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就是按算术级数增长。如果我们当时客观地去研究他的主张，可以看出他声明自己和马尔萨斯不一样是符合实际的。可是当时“攻”他时，把他的这些声明都置之不顾，就说他在贩卖马尔萨斯主义。马老曾经说过：对于他的人口主张不管赞成或反对，只要有道理，就可以听。他特别指出，有那么一种人，最招人生气，他们见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反对的多，他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气愤地说：“这种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产党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这一番话今天听起来都很有现实感。我们这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当初非但没有守住岗位，而且推波助澜，把良药当作毒草，想起来真叫人痛心！

马老解放后在人口问题上也说过一些不对的话，如说人多了就会去侵略别人之类，但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用学术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何况他对自己这一错话已经认错，那就更不能乱给人扣帽子，采取压服的办法。马克思对待学术问题从来都是合情合理的，即使跟别人在某些问题上有所分歧时，也并不是把对方一棍子打死，而是对别人在科学上哪怕些微贡献，也要提出来加以肯定。譬如，马尔萨斯在马克思笔下可以说是最卑贱的人物了，可是就这样，马克思对他的某些地方也都肯定过。正如恩格斯说的：“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

关于这个问题：《经济研究》1979 年第 9 期发表张立中同志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一文，作了很好的说明。

作出善意的评价。”

总之，当年对马老的批判在学风上是很有问题的。虽然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大讲种种道理，实际上必然会引起人们的一种错觉，好像凡是提倡节育者，就是马尔萨斯主义者，在我国人多只能是好事，不可能发生什么问题，等等。这种观点对 20 年来增加起来的两三亿人口是负有相当责任的。马老始终对强加给他的批判不服，他在 1959 年 11 月说：“我虽年近 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马老这种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一切理论工作者学习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马老的人口理论是正确的，是适用于我国具体情况的，对于在广大群众中开展节育宣传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我们现在一方面要肯定马老的人口理论；一方面也要总结当年批判他时在学风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免重蹈覆辙，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

原载《经济研究》1979 年第 10 期

附录三：
朱正直等著《马寅初传》序

许德珩

马寅初先生逝世两周年了，北大的同志为他写传，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和马寅初先生是在1919年认识的，他当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教务长，我在北大文科念书，我算是他的学生了。因为我们一道参加五四运动，我们就更相识了。

五四运动时，我还记得马老在天安门前讲演，题目是“中国的希望在于劳动者”。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校长为了抗议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马寅初先生与其他教授联合到教育部请愿，表示，如蔡不回校，北大教员“即一总辞职”。

在重庆，马老反对蒋介石，反对“四大家族”。当时，我也在重庆，有些会议我们是一起参加的。马老痛斥孔祥熙、宋子文，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因而被捕。周恩来同志到处奔走营救，我和各界人士也在各种场合呼吁，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马寅初教授。

解放后，马老任北京大学校长，我本来已是北大教授，因解放后事务颇多，不能兼顾学校事务，因此辞去了北大教授之职，他聘我当校务委员，我对他的邀请，怎能不从命？因此，我们常常在北大开会，一道商量工作。我记得解放初期，组织了一个高等教育委员会，董必武同志当委员会的召集人，委员为马叙伦、张奚若、曾昭伦等，钱俊瑞为秘书长，马老对教育也常提意见。这个委员会建议取消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政府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停办了这些学校。后来，北京大学就搬进了燕京大学的旧址——位于北京西郊的燕园。

解放初期，我和马老一道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大会后，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副团长是一个人一间包厢，马老嫌寂寞，他邀我和他住同一包厢，经组织上同意，我遂与马老两人同住，促膝谈心。他谈风很健，我们相处非常之好。

马寅初实际上是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领袖，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后来，他因“新人口论”、计划生育问题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马老在人口问题上的远见卓识遭到错误的批判，致使我国的人口增长失去控制。回想起来，真叫人痛心。当时，我是非常同情马老“新人口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终于给马老平了反，对马老的人口理论和为人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马老百岁寿辰之际，我写了祝贺诗：

百岁期颐，学界泰斗。
桃李满园，循循善诱。

深谋远虑，国家人口。
松柏长青，谨以为寿。

马老仙逝后，我写诗悼念：

先生归道山，上寿百零一。
平生嫉腐恶，人民同呼吸。
息烽受奇辱，愤然以对敌。
深谋与远虑，人口增长急。
先忧天下忧，哲人其萎矣。
悼念痛心怀，万众齐饮泣。

但是，这些贺诗和悼词，不能表达我对马老的崇敬和悼念之情的万分之一！

马老长我八岁，我多么期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马寅初传》的出版啊！现在，这一期望就要实现了。我很高兴为《马寅初传》题字、写序，以表示我对马老的怀念和敬意。

1984年3月

附录四：

马寅初主要论著目录

- 纽约市财政 纽约 1914 年
马寅初教授论法科应废止毕业论文
《北京大学月刊》1918 年 5 月 17 日
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
《北京大学月刊》第 1 卷 3 号 1919 年 3 月
战时之物价与货币
《北京大学月刊》第 1 卷 4 号 1919 年 4 月
大战前欧美各国之不换货币与我国的金钞
《北京大学月刊》第 1 卷 4 号 1919 年 4 月
吾国信托公司前途的推测
《总商会月刊》第 1 卷 1 号 1921 年 1 月
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讲演辞
《北京大学月刊》第 1 卷 3 号 1921 年 12 月 5 日
中国之九大经济问题
《东方杂志》第 19 卷 1 号 1922 年 1 月 10 日
中国国际贸易之真相
《东方杂志》第 19 卷 10 号 1922 年 5 月 25 日
马寅初演讲集（1—4）
《商务印书馆》1923 年 9 月

第 1 集

- 银行之根本问题（1920 年 10 月）
吾国恶币之影响（1920 年 11 月）
中国的交易所（1920 年 12 月）
上海交易所前途之推测（1921 年 2 月）
上海 140 个交易所（1921 年 12 月）
吾国币制之整理（1921 年 1 月）
外国货币买卖之危险（1921 年 2 月）
经济学中之重要哲理（1921 年 3 月）
通货派与银行之学说（1921 年 5 月）
中外国际贸易之比较（1921 年 5 月）
今日之轻质铜元问题如何解决（1921 年 5 月）
中外汇兑之缺点（1921 年 5 月）
货币之起源（1921 年 6 月）

信托公司（1921年6月）
吾国信托公司前途之推测（1921年7月）
中国的经济问题（1921年8月）
评今日我国之讲社会主义者（1922年3月）
银行及交易所与社会之关系（1921年4月）
批评普通人对于银行与钱庄之心理（1921年4月）
吾国商界与银行界须注意于商业票据（1921年4月）
国钞挤兑不合乎经济原则（1921年11月）
世界最大之国家银行如何维持（1921年11月）
关于与国钞挤兑之关系（1921年12月）
今日洋商银行之势力（1921年12月）
中国之九大经济问题（1922年1月）
1400万盐余国库券之利息如何计算（1922年2月）
中国国际贸易之真相（1922年3月）
十一年公债之市价如何计算（1922年10月）
创设农工银行之必要（1922年10月）
马克思学说与李士特学说二者孰宜于中国（1922年5月）
上海金融状况（1922年2月）
太平洋会议与吾国关税问题（1921年11月）
裁厘加税问题（1922年10月）
中国银行所居之地位（1922年11月）
地方财政（1922年10月）
中国重利问题（1922年11月）
吾国银行发行钞票困难之原因（1922年12月）
何谓经济（1922年12月）
金融界应注意之要点（1922年11月）
好政府与好商人（1921年12月）
吾国关税与币制的关系
读晏君才杰著公债论抒所见（1922年1月）
经济界之危险预防法（1920年5月）
中国公债问题（1921年7月）

第2集

以科学眼光观察中国之财政与金融（1924年3月）
读第五届银联会议决各案随抒我见（1924年4月）
中外救济银根紧急方法之不同（1924年1月）
中国何以如此之穷（1924年5月）

欧战后之货币
整理案内各种公债涨价原因（1924年5月）
中国财政与教育之关系
中国银行界前途之危机
何以上海必须设立票据交换所（1924年4月）
改革吾国币制之第一步
价值
出洋学经济与商科的留学生应有何种预备
吾国创办公司之困难
公库制与集中制之比较
中国财政之根本问题
上海之银洋并用问题
短期财政计划我见（1923年4月）
今日吾国经济状况之一斑（1923年3月）
中外信用制度之异同（1922年1月）
吾国滥铸铜元之原因（1922年10月）
中国女子经济问题
吾国银行业与欧美银行业之比较
何谓九八规元
日本震灾后金价何以看跌投机家何以失败
我国经济界之三滥（1923年12月）
吾国新式银行之准备金问题
上海金融紧缩之原因（1922年3月）
票据交换所与上海钱业汇划总会（1922年1月）
吾国银行业历史上之色彩
银之市场与银之现期两种买卖
吾国关税问题（1924年8月）
经济与教育之关系（1924年8月）
中国之银行问题
兑换纸币
吾国公债票之买卖
有奖储蓄存款之害及其推算方法
格来森法则之研究
吾国公司之弊病
中国外债之特色（1924年8月）
金佛郎问题之研究
无确实抵押品之内外债问题（1924年8月）
中国币制问题（1924年8月）

德发债票问题（1924年8月）

一年来之金融

第3集

如何提倡中国工商业

吾国之财政适合于对外宣战否（1925年7月）

汇丰银行

不平等条约与中国经济之关系（1925年8月）

上海不宜继续罢市（1925年6月）

中英日之经济关系（1925年6月）

以抵制英日货代保护关税

上海租界之历史及其性质

筹款方法与抵制英日货

总罢市总罢工之足以自杀

不平等条约于我国经济上之影响（1925年6月）

中国预算之缺点

上海经济新闻如何读法（1924年）

中国国家税与地方税之划分

吾国何以不能施行贴现政策

中国财政之紊乱

英国之过去现在和将来（1925年10月）

上海之工部局（1925年10月）

十三年中国经济恐慌之根本原因（1924年12月）

中国劳资问题（1925年8月）

中国缺乏资本之影响（1925年10月）

经济要素（1925年9月）

中国财政之改造（1925年10月）

中国经济之分裂（1925年8月）

吾国之入超如何补救

中国农工商矿之状况（1925年7月）

五卅事件后中国经济上之损失（1925年10月）

我国银行间相互往来何以不甚密切

中国关税问题之研究

关税特别会议（1925年10月）

收回权利与关税问题

中国关税问题（1925年10月）

关税自主权何以必须收回（1925年11月）

国民对于关税会议应注意之要点（1925年11月）
关税会议日美提案之比较（1925年11月）
关税自主与出厂税问题
关税会议与英日美（1925年12月）
关税会议与关款存放问题（1925年12月）
关税会议与出口税（1925年12月）
中国整金与外国厘金之比较（1925年12月）
日本之对于二五附加税与法国之对于奢侈税

第4集

反对今日之禁烟办法（1927年11月）
评财政部浙江禁烟局改组宣言
鸦片问题（1928年1月）
本省之禁烟问题（1927年11月）
北大之责任与鸦片问题（1928年2月）
北大之精神（1927年12月）
中国之经济组织（1927年11月）
吾国编制预算之困难（1927年11月）
中国银行制度问题（1927年11月）
中国之劳资问题（1928年1月）
何谓商（1927年11月）
马克思价值论之批评（1927年10月）
帝国主义与新经济政策（1927年8月）
营业税在税制中之地位（1927年9月）
市财政（1927年7月）
银价低落救济问题（1927年2月）
中国之劳农与经济（1927年10月）
新经济政策下之金融问题（1927年5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实行之可能性否？（1927年5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劳农（1927年4月）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障碍（1927年5月）
中国今日之劳资问题（1927年3月）
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尚共产乎，抑尚均富乎？（1927年3月）
在中国的洋商（1925年11月）
附致北京英文日报及北京英文导报记者的信（1925年12月）
中国经济上之根本问题（1926年10月）
中俄经济上之关系（1927年4月）

为整理内外债所发行一种统一公债究以何种货币为宜（1926年12月）

营口由银码头渐变为空码头之原因及其经过（1925年10月）

思想与经济（1927年6月）

平均地权（1927年10月）

现代之新经济政策（1928年3月）

女子之正当运动（1927年5月）

投机与赌博之区别（1927年2月）

农村信用合作社（1926年10月）

不平等条约外的不平等（1927年10月）

吾国内债亟应改良之几点（1926年）

禁烟应归财政部办理乎？（1928年4月）

有价证券之贷借（1926年）

关于禁烟问题之几个要点（1928年4月）

俄国庚款之估计（1926年）

台湾禁烟之办法（1928年3月）

浙江之两税制（1928年3月）

今日之佛教（1928年5月）

东三省之货币交易与套印

上海之银洋并用问题

《东方杂志》第21卷6号1924年1月

中国财政之根本问题

《东方杂志》第21卷3号1924年2月10日

价值论

《东方杂志》第21卷11号1924年6月

利用外资的三种方法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卷1号1924年

不平等条约于我国经济上之影响

《东方杂志》第22卷16号1925年8月

汇丰银行

《东方杂志》第22卷18号1925年9月25日

汇丰银行

《东方杂志》第22卷19号1925年10月10日

中国国外汇兑

《商务印书馆》1925年12月

银行之势力何以不如钱庄

《东方杂志》第23卷4号1926年2月

中国历年入超之解释及其危险

《东方杂志》第23卷8号1926年4月

中国之财政与金融
《东方杂志》第 23 卷 21 号 1926 年 11 月
中日现行通商航海条约之研究
《东方杂志》第 23 卷 23 号 1926 年 12 月
中国经济上之根本问题
《东方杂志》第 24 卷 4 号 1927 年 2 月
中华银行论
《商务印书馆》1929 年 7 月
中国租佃制度之研究
《经济学季刊》第 1 卷 1 期 1930 年 4 月
关税征金与改革币制
《经济学季刊》第 1 卷 2 期 1930 年 7 月
中国关税问题
《商务印书馆》1930 年
裁厘后的营业税问题
《经济学季刊》第 2 卷 2 号 1931 年 6 月
德国之营业税
《经济学季刊》第 2 卷 2 号 1931 年 6 月
营业税在税制上之地位
《经济学季刊》第 2 卷 2 号 1931 年 6 月
浙江之营业税
《经济学季刊》第 2 卷 2 号 1931 年 6 月
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
《东方杂志》第 28 卷 24 号 1931 年 12 月 25 日
长期抵抗的准备
《时事月报》第 6 号 1932 年 6 月
马寅初经济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1932 年 12 月

第 1 集

票据法原则
票据法总说明
新颁布之票据施行法
新颁布之交易所法
公司法施行法之精意
平均地权
怎样去平均地权

中国的租佃制度
英国停止金本位之前因后果
日本的金解禁问题
购买力平价
商标与商标法
再论商标与商标法
新颁布之商标法
营业税法之精意
裁厘后的营业税问题
浙江之营业税
营业税在税制上之地位
浙江营业税之现状
营业税之模范
田赋改革之必要
中国之盐税问题
外货倾销亟应取缔论
普通银行法草案具体说明
对于钱庄法之意见
关于储蓄银行法之各种意见
读徐青甫先生“国难期间经济之设计”书后
国难期间之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制
长期抵抗之准备
战债和赔款之缓付问题
世界经济之大势
国难期间世界经济大势
废两改元问题
再论废两改元并答吴经熊先生（附吴经熊先生文）
银价跌落救济问题
银价跌落与人民生活之关系
物价变动之影响
银贱潮中应注意前因后果
读财政部甘未尔设计委员会改革币制计划书后
印度之改用金块本位制
关税征舍问题
反对今日之鸦片政策
浙江土地陈报及改正赋额
辽宁之金融

中国土地整理问题

《银行周报》第 17 卷 29 号 1933 年 2 月 1 日

新商会法与工商同业工会法

《经济学季刊》第 4 卷 1 号 1933 年 3 月

棉麦借款问题

《军需杂志》第 22 号 1933 年 6 月

凯塞尔社会经济学原理之解释

《经济学季刊》第 3 卷 3 号 1933 年 9 月

中国之工资与利息问题

《银行周报》第 17 卷 39 号 1933 年 10 月

世界经济大势

《经济学报》第 5 卷 8—9 号 1933 年 10 月

马寅初讲世界经济会议失败与中国之关系

《之江校刊》第 58 期 1933 年 10 月 31 日

复兴农村的途径

《华安》第 2 卷 1 期 1933 年 11 月 10 日

中国家庭思想与经济关系

《商学期刊》第 2 卷 3 号 1933 年 11 月

提倡国货的方法

《南京市政》第 35 期 1933 年 11 月 30 日个人计划

《东方杂志》第 31 卷 1 号 1934 年 1 月 1 日

中国币制本位问题

《经济学月刊》第 1 卷 2 号 1934 年 1 月

中国金融制度之缺点与其改革方案

《申报月刊》第 3 卷 1 号 1934 年 1 月

上海金融组织及其缺点

《商学期刊》第 8 号 1934 年 1 月

世界经济会议之失败与我国统制经济之关系

《军需》第 24 期 1934 年 1 月

统制经济问题

《时事》第 10 卷 2 期 1934 年 2 月 1 日

白银协定批准问题

《河北财政》第 53 期 1934 年 2 月

中国之土地整理问题

《军需》第 25 期 1934 年 5 月

美国白银政策与我国之利害

《时事》第 10 卷 4 期 1934 年 4 月 1 日

美国白银政策与白银协定

《银行周报》第 18 卷 12 号 1934 年 4 月
对白银协定意见

《民智》第 3 卷 4 期 1934 年 4 月 16 日
美国之吸收黄金白银政策与我国之关系

《东方杂志》第 31 卷 8 号 1934 年 4 月 16 日
制度学派康孟氏之价值论（上）

《经济学季刊》第 5 卷 1 号 1934 年 4 月
余对于银行资本额股东负双倍责任及储蓄银行董事监察负连带无限责任
之意见

《银行周报》第 18 卷 18 号 1934 年 5 月
全国财政会议议决之重要原则

《东方杂志》第 31 卷 14 期 1934 年 7 月 16 日
田赋改革之必要

《浙江财政》第 7 期 1934 年 7 月
利用外资之三种方法

《中山文化》第 1 期 1934 年 8 月
制度学派康孟氏之价值论（下）

《经济学季刊》第 5 卷 2 号 1934 年 8 月
有奖储蓄及白银问题

《武汉日报》1934 年 9 月 5 日
亟应准备之战时财政问题

《银行周报》第 18 卷 34 号 1934 年 9 月
白银出口问题

《国货日报》第 1 卷 9 期 1934 年 9 月
湖南之经济与金融

《银行周报》第 18 卷 39 号 1934 年 10 月
如何使上海游资及外国余资流入内地以为复兴农村之准备

《武汉日报》1934 年 11 月 10 日
马寅初讲白银问题

《晨报》1934 年 11 月 9 日
国富与未来大战之关系

《武汉日报》1934 年 11 月 11 日
世界第二次大战我国经济上的准备

《青年》第 1 卷 12 期 1934 年 11 月 16 日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想之两大派

《银行周报》第 18 卷 46 号 1934 年 11 月
评财政部之白银政策

《时事月报》第 11 卷 6 期 1934 年 12 月 1 日

快乐之生活

《东方杂志》第 31 卷 24 号 1934 年 12 月 16 日

发展工农与集中力量

《银行周报》第 18 卷 50 号 1934 年 12 月 25 日

白银问题

《国府文职》第 1 期 1934 年 12 月

《武汉日报》1935 年 1 月 20 日

入超问题

《国府文职》第 1 期 1934 年 12 月

资本主义发展史

《商务印书馆》1934 年

经济力量集中之途径与运用之范围

《文化建设》第 1 卷 4 号 1935 年 1 月 1 日

《四川经济月刊》第 3 卷 1 期 1935 年 1 月

中国棉业之前途

《东方杂志》第 34 卷 13 号 1935 年 1 月

有奖储蓄与民族自觉

《中央日报》1935 年 1 月 24、27 日

中国经济改造

《商务印书馆》1935 年 1 月

马寅初对最近几件金融立法的说明

《武汉日报》1935 年 2 月 3 日

《中央日报》1935 年 2 月 16 日

个人主义与全体主义

《武汉日报》1935 年 2 月 17 日

最近的几件金融立法

《时代公论》第 3 卷 47 号 1935 年 2 月

利用外资方式中之华洋合资问题

《银行周报》第 19 卷 11 号 1935 年 3 月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真谛

《中央日报》1935 年 5 月 23 日

入超问题与利用外资

《时事月报》第 13 卷 5 号 1935 年 5 月

我国银本位应放弃乎抑应维持

《中央日报》1935 年 6 月 3 日

对白银问题意见

《中央时事》第 4 卷 23 期 1935 年 6 月 22 日

金融与财政

《武汉日报》1935年6月30日
中国之经济危机
《学校生活》第109期1935年6月30日
公库制问题
《国府文职》第2期1935年6月
定额分配输入制问题
《国府文职》第42期1935年6月
请国人注意银向及并对美国经济考察团进一忠告
《交易所周刊》第1卷23号1935年6月
吾国生产问题中之两方面——货币方面与经济方面
《银行周报》第19卷24号1935年6月
世界经济恐慌之起源过程及其结果
《国府文职》第2期1935年6月
中国经济问题与中国货币问题
《国府文职》第2期1935年6月
《武汉日报》1936年1月1日
中国与中国之对策
《东方杂志》第32卷13号1935年7月1日
中国经济之危机（续）
《学校生活》第110期1935年7月10日
苏俄经济生活之鸟瞰
《银行周报》第19卷29号1935年7月
世界经济恐慌如何影响及于中国与中国之对策
《东方杂志》第32卷13号1935年7月
就银本位之资格论中国可否放弃银本位
《武汉日报》1935年8月11日
中国要早日实行工业化
《津浦铁路》第5卷8期1935年8月
《交大季刊》第17期1935年9月
吾对于经济建设之意见
《银行周报》第19卷32号1935年8月
英日联合对华投资问题
《武汉日报》1935年10月26日
个人主义之将崩溃
《银行周报》第19卷41号1935年10月
欲解决入超非利用外资不可
《银行周报》第19卷38号1935年10月
补救金本位制之四种方案

《银行周报》第 19 卷 46 号 1935 年 10 月
中国之经济建设

《上海党事》第 1 卷 45 期 1935 年 12 月 1 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开拍产业证券之可能乎

《东方杂志》第 33 卷 1 号 1936 年 1 月 1 日
中国经济改造之中心问题

《武汉日报》1936 年 1 月 19 日
再论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

《银行周报》第 20 卷 4 号 1936 年 2 月
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

《劳动生活》第 1 卷 3—4 期 1936 年 3 月 1 日
入超与币制改造问题

《武汉日报》1936 年 3 月 16 日
论纸本位

《银行周报》第 20 卷 9 号 1936 年 3 月
论英国之外汇平准基金

《银行周报》第 20 卷 14 号 1936 年 4 月
中国新金融政策与银价跌落之关系

《武汉日报》1936 年 5 月 17 日
稳定物价与稳定汇价

《银行周报》第 20 卷 19 号 1936 年 5 月
非常时期之财政问题

《上海申报》1936 年 5 月 24、26 日
防止走私最好方法

《中央日报》1936 年 6 月 7 日
内价与外价之关系

《武汉日报》1936 年 6 月 10 日
非常时期之经济问题

《武汉日报》1936 年 6 月 14 日
非常时期的管理经济

《管理》第 1 卷 2 期 1936 年 7 月 6 日
我国币制能不受任何国家币制度变动之牵制乎

《银行周报》第 20 卷 32 号 1936 年 8 月
国际贸易何以有统制之必要

《武汉日报》1936 年 9 月 13 日
马寅初在中国经济学新 13 届年会闭幕词

《经济学季刊》1936 年 9 月
各国经济统制之理论与实际

《银行周报》第 20 卷 36 号 1936 年 9 月
经济统制之理论与实际（续）

《银行周报》第 20 卷 41 期 1936 年 10 月 20 日
法郎贬值与中国

《银行周报》第 20 卷 24 期 1936 年 10 月 27 日
法郎贬值与我国所受影响

《中央日报》1936 年 10 月 17 日
意大利之经济统制

《银行周报》第 20 卷 45 期 1936 年 11 月 7 日
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及货币政策

《经济学季刊》第 70 卷 3 号 1936 年 11 月
世界经济大势与中国前途

《银行周报》第 20 卷 45 期 1936 年 12 月 8 日
中日问题

《东方杂志》第 34 卷 1 号 1937 年 1 月 1 日
二种主义之相互影响

《武汉日报》1937 年 1 月 1 日
日本工业进步之原因

《银行周报》第 21 卷 2 期 1937 年 1 月 9 日
经济思想随社会环境变迁之程序

《东方杂志》第 34 卷 1 号 1937 年 1 月
中国之工业化

《银行周报》第 21 卷 7 期 1937 年 2 月 3 日
马寅初讲国际经济

《杭州市教》1937 年 2 月 6 日
中国国际外贸如何失去权利与古典派学说应如何更正

《武汉日报》1937 年 2 月 14 日
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与纸币政策

《新商业》第 2 卷 2 期 1937 年 3 月 6 日
非大量生产之中国经济及其救济办法

《银行周报》第 21 卷 10 期 1937 年 3 月 6 日
奖励国货工厂困难与增加资本之方法

《银行周报》第 21 卷 14 期 1937 年 4 月 3 日
中国经济之复兴与减抵利息之必要

《中山文化》第 4 卷 2 期 1937 年 4 月 6 日
中国工业进步迟滞之原因及其救济办法

《海王》第 9 卷 24 期 1937 年 5 月 1 日
我国预算法币与工业之连锁关系

《银行周报》第 21 卷 18 期 1937 年 5 月 1 日
解决分配世界资源问题当从自由贸易做起

《世界政治》第 1 卷 5 期 1937 年 5 月 5 日
中国保险事业与新中国建立之关系

《银行周报》第 21 卷 19 期 1937 年 5 月 8 日
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上、下册）

《商务印书馆》1937 年 7 月
法郎贬值

《武汉日报》1937 年 11 月 29 日
国际经济大势与中国之危机

《武汉日报》1937 年 12 月 20 日
战时财政问题

《四川经济月刊》第 9 卷 12 号 1938 年 2 月
二十六年暑期庐山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

《四川经济月刊》第 9 卷 1·2 合期 1938 年 2 月
统一公债之检讨

《四川经济月刊》第 9 卷 4 号 1938 年 4 月
中国社会组织与传统的经济思想的关系

《四川经济月刊》第 9 卷 5 号 1938 年 5 月
余对于改善地方金融机构之意见

《四川经济月刊》第 9 卷 6 号 1938 年 6 月
法币与公债政策

《时事类编》第 15 期 1938 年 6 月
大工业之外同时维持小工业

《现代读物》第 2 卷 7 期 1938 年 7 月
非常时期的法币与外汇

《四川经济月刊》第 10 卷 3 号 1938 年 9 月
欧战后马克何以崩溃

《四川经济月刊》第 10 卷 3 号 1938 年 9 月
消极的经济制裁不如积极的实施援助

《四川经济月刊》第 10 卷 3 号 1938 年 9 月
论立法院通过之总遗产税

《武汉日报》1938 年 10 月 18 日
所得税暂行条例施行以来所表现之流弊

《重庆·扫荡报》1938 年 10 月 30 日
论战时过分利得税

《经济动员》第 8 号 1938 年 11 月
统制物价为节约运动与长期抗战之先决问题

《四川经济月刊》第 10 卷 6 号 1938 年 12 月
中国法币与英币联系之理由
重庆与桂林的《扫荡报》1938 年 12 月 4 日
政府对于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办法之要点
《国民公报》1938 年 12 月 11 日
门户开放与高尚思想
《经济动员》第 2 卷 2 期 1938 年 12 月 31 日
读书与经济
《经济知识》第 1 卷 1 期 1938 年 12 月
论总遗产税与分遗产税
《财政评论》第 1 卷 1 号 1939 年 1 月
法币法价打破之危险
《财政评论》第 1 卷 2 号 1939 年 2 月
法币与抗战
《新华日报》1939 年 2 月 20 日
统治物价政策中之最高价与最低价
《国民公报》1939 年 2 月 26 日
日本支那通提出破坏法币之种种方案及其结果
《时事新报》1939 年 3 月 5 日
核减利率应以一般经济情形为对象
《国民公报》1939 年 3 月 26 日
中国的专利法
贵阳《中央日报》1939 年 4 月 30 日
论华北伪“临时政府”之币制统制及其对策
《时事月报》1939 年 4 月号
论外汇平准基金
《财政评论》第 1 卷 5 期 1939 年 5 月
何以急需吸收国内资金
《经济动员》第 3 卷 7、8 合期 1939 年 9 月
中国之国际贸易
《西南实业通讯》第 1 卷 4 号 1940 年 4 月
怎样稳定法币
《新华日报》1940 年 6 月 1 日
抗战第四年经济
《新华日报》1940 年 7 月 3 日
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
《时事类编》特刊第 54 号 1940 年 7 月
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

《时事类编》特刊第 57 期 1940 年 10 月 20 日

战时经济问题

《新华日报》1940 年 11 月 8 日

战时经济政策

《新华日报》1940 年 11 月 11 日

西南经济建设与继续抗战的先决条件

香港《工商日报》1940 年 12 月 6 日

战后的经济问题

香港《大公报》1940 年 12 月 8 日

经济学概论

《商务印书馆》1943 年 1 月

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民主与科学》第 1 卷 1 号 1945 年 1 月

在世界和平的民主潮流中，中国需要伟大政治家，能够真正膺总理遗教，
为老百姓做事

《新华日报》1945 年 3 月 6 日

在欢宴文化战士郭沫若会上的讲话

《新华日报》1945 年 4 月 9 日

国际形势与国内政治的联系——记马寅初先生在交大的演讲

《新华日报》1945 年 5 月 19 日

《战时经济论文集》《作家书屋》1945 年 5 月

（目录）

经济力量集中之途径与运用之范围（1935 年 1 月）

意大利之经济统制（1936 年 11 月）

我国预算法币与工业之连锁关系（1937 年 2 月）

中国之银行制度（1937 年 6 月）

二十六年暑期庐山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1938 年 2 月）

统一公债之检讨（1938 年 4 月）

论战时过分利得税（1938 年 5 月）

将来之法币（1938 年 5 月）

余对于改善地方金融机构之意见（1938 年 6 月）

大工业之外同时维持小工业（1938 年 7 月）

非常时期的法币与外汇（1938 年 8 月）

第一次欧战后马克何以崩溃？（1938 年 9 月）

消极的经济制裁不如积极的实施援助（1938 年 9 月）

论立法院通过之总遗产税（1938 年 10 月）

所得税暂行条例施行以来所表现之流弊（1938 年 7 月）

中国法币与英镑联系之理由（1938 年 12 月）

政府对于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办法之要点 (1938 年 12 月)
法币法价打破之危险 (1938 年 12 月)
门户开放与高尚思想 (1938 年 12 月)
统制物价为节约运动与长期抗战之先决问题 (1939 年 1 月)
统制物价政策中之最高价与最低价 (1939 年 2 月)
日本支那通提出破坏法币之种种方案及其结果 (1939 年 3 月)
核减利率应以一般经济情形为对象 (1939 年 3 月)
中国的专利法 (1939 年 4 月)
论华北伪临时政府之币制统制及其政策 (1939 年 4 月)
论外汇平准基金 (1939 年 5 月)
中国之国际贸易 (1939 年 6 月)
中日货币战 (1939 年 6 月)
何以急需吸收国内资金 (1939 年 9 月)
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 (1940 年 7 月)
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 (1940 年 10 月)
月)
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纸货 (1940 年 11 月)
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1944 年 12 月)
经济力量集中之途径与运用之范围 (1935 年 1 月)
中国战后之福利经济
《民主与科学》第 1 卷 5、6 合期 1945 年 5、6 月
《新华日报》1945 年 6 月 29 日
黄金政策所表现之经济政策
《商务日报》1945 年 9 月 17 日
肃清贪污才能实现工业化，一切都取决于民主
——马寅初先生讲妇女问题
《新华日报》1945 年 9 月 17 日
马寅初讲投资与国际贸易
《商务日报》1945 年 10 月 25 日
工业革命与土地政策
《新民报》1946 年 1 月 1 日
急起自救
《新华日报》1946 年 1 月 11 日
吾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希望 (人民对政治协商会议意见)
《新华日报》1946 年 1 月 11 日
我国经济问题
《新蜀报》1946 年 1 月 10 日
新公司法和官僚资本

《商务日报》1946年2月5日
马寅初教授在各校演讲——为什么要庆祝政协成功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4日
中国工业要有发展，必须坚决反对官僚资本——在中国经济事业协会四川分会成立会上讲话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中国战后之经济建设
《商务日报》1946年3月30日
中国今后应采的经济政策
《商务日报》1946年4月1日
挽救目前经济危机非打倒官僚资本不可
《新华日报》1946年4月9日
马寅初讲当前经济问题
《商务日报》1946年4月10日
向王若飞诸先生学习
《新华日报》1946年4月19日
马寅初谈外汇问题
《商务日报》1946年5月2日
中国目前经济之危机
《商务日报》1946年5月4日
经济政策要通盘打算
《世界日报》1946年5月21日
外汇问题
《银行通讯》第6号1946年5月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商务日报》1946年5月21日
马寅初讲黄金政策
《商务日报》1946年5月26日
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
——马寅初先生在沪江大学讲演纪录
上海《文汇报》1946年6月5日
解救当前经济危机，首须解决政治问题
《新华日报》1946年6月15日
农业、工业与国防工业之连锁
《经济周报》第2卷22号1946年6月
关于中美商约
《经济周报》第3卷20号1946年11月14日
消息传出上海震动，民主人士一致愤慨

《新华日报》1946年12月31日
土地税
《观察》第1卷18号1946年12月
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10日、12日
1947年经济展望
《经济周报》第4卷1号1947年1月2日
农工配合与力量集中
《大学月刊》第6卷1期1947年1月
今日我国经济的总检讨
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10、11日
《现代经济文摘》第1年1号1947年2月
英美经济问题与中国经济问题（2月7日在暨南大学讲词，湖深笔录）
上海《文汇报》1947年2月9日
金钞黑市禁不掉
上海《联合晚报》1947年2月19日
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
上海《文汇报》1947年2月27日
《商务日报》1947年3月3日
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行得通吗？
《现代经济文摘》第1年1号1947年3月
经济学者工作的对象
上海《文汇报》1947年3月4日
在今日的中国，何以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上海《文汇报》1947年3月5日
人权
《文汇报》1947年3月26日
马寅初论美金债券
上海《文汇报》1947年3月30日
以德服人欤抑以力服人欤？
上海《文汇报》1947年4月12日
中国经济之路
《经济评论》第1卷4号1947年4月弊病太多了
上海《大公报》1947年3月30日
《现代经济文摘》第1年5号1947年4月
对日贸易开放与损害赔偿问题
《大学月刊》第6卷3、4合刊1947年4月
论外汇政策与魏使声明
《金融汇报》第54号1947年9月17日

中国经济问题决于政治
《经济评论》第2卷1期1947年10月4日

如何建设国民经济
《中国建设》第3卷2号1947年

通货新论
《商务印书馆》1947年

论“恢复银本位”
《中国建设》第6卷2号1948年5月

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
《商务印书馆》1948年

我为什么赞成开征财产税和资本税
《经济评论》第2卷15期1948年1月10日

马寅初先生在欢迎会上讲演词
《人民日报》1949年5月26日

中国现阶段统一财经工作的轮廓
《展望》第5期1950年4月29日

革命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反动政府经济政策之比较
《经济周报》第11卷7期1号1950年8月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展望》第6卷5期1950年8月

加强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6日

我对二届世界和平大会的感想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9日

绝不能等待和平必须争取和平
《上海工商》第2卷8号1951年1月

看得见的成就看不见的成就和想不到的成就
《光明日报》1951年6月24日

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
《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3日

在毛主席领导下努力完成抗美援朝任务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
《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9日

华东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报告
《解放日报》1951年11月26日

驳资产阶级的荒谬论调(马寅初8日对上海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
《人民日报》1952年2月11日

彻底粉碎美国侵略军的阴谋

《人民日报》1952年3月14日
我国1952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的优越性和特点
《经济周报》第34期1952年
《人民日报》1952年8月17日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团结起来为拯救和平而斗争
《人民日报》1952年9月5日
1953年国家财政收支预算的特点
《人民日报》1953年3月27日
庆祝1953年的胜利
《经济周报》第39期1953年
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新华月报》1953年3月号
为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而努力（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新华月报》1954年6期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谈话（祝贺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
《人民日报》1954年7月27日
马寅初代表的发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人民日报》1954年9月27日
坚决反对使用原子武器欢呼我国和平使用原子能的研究
《光明日报》1955年2月18日
新中国货币制度的特点与优越性
《人民日报》1955年3月9日
愤怒和哀悼
《光明日报》1955年4月17日
向莫斯科大学致热烈的祝贺——为莫斯科大学校刊而作
《光明日报》1955年5月7日
亚洲区域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人民日报》1955年5月18日
发刊词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5年7月1日
庆祝莫斯科大学开学200周年
《人民日报》1955年8月7日
热烈欢迎新同学
《北京大学校刊》1955年9月9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
《北京大学校刊》1955年9月30日
视察中的八个印象（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新华半月刊》第 88 期
《光明日报》1956 年 6 月 23 日
我也来谈百家争鸣
《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11 日
我国预算的优越性
《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18 日
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28、29 日
马寅初在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谈控制人口问题
《光明日报》1957 年 4 月 3 日
马寅初谈人口问题
《文汇报》1957 年 4 月 27 日
《北京日报》1957 年 4 月 29 日
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
《大公报》1957 年 5 月 9 日
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11、12 日
两种性质不同物价上涨
《大公报》1957 年 5 月 12 日
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学校党委制不能退出学校
《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16 日
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言论发表些意见
《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15 日
新人口论（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5 日
我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的复辟
《文汇报》1957 年 10 月 3 日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北京大学学报》1957 年第 3 期
学习苏联贯彻社会主义教育路线
《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10 日
谈谈我锻炼身体的体会
《新体育》1957 年第 8 期
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财政出版社 1958 年 2 月
马寅初校长的两张大字报
《北京大学校刊》1958 年 3 月 21 日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四”

《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4月30日
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
《光明日报》1958年5月9日
有计划的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发言）
《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6期
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
《光明日报》1958年7月24、29、30、31日
《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
两个请求转载的理由
《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1号
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
《新建设》1959年11月
重申我的请求
《新建设》1960年第1期
新人口论
《北京出版社》1979年11月

